



总第70期

70

2017年 | 第3期 |

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

SHENZHEN LAWYERS

深圳律师

—— 非常视线 专业见解 ——



十届律协三年工作规划出炉，明确108项任务
防、预、辩、险——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中的四字法宝
播种公平正义，一直在路上



深圳律协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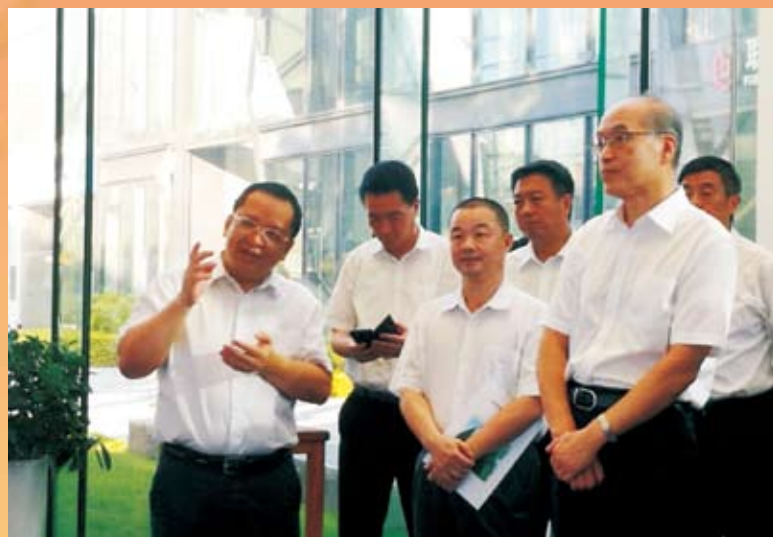
司法部部长张军调研 深圳律师业并寄予厚望

2017年9月11日-12日，司法部部长张军莅临深圳调研司法行政工作，期间听取我市律师业工作情况汇报，与市司法局、市律协负责人开展交流并视察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

9月11日下午，张军部长听取了华商林李黎联营所在创建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创建“国际创客法律服务中心”、构建前海商事调解体系等方面创新发展的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了该所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双创”等国家发展战略取得的成效，特别指出律师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针对律所提请司法部从政策方面对联营所建设发展给予帮助和扶持的诉求，

张军部长正面回应并当场给予明确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将意见问题收集向部里反映，尽快开展调研论证，提出解决方案。

9月12日下午，张军部长在调研过程中听取近期市律协重点推动的几项工作，并对协会建设和律师业发展提出几点期望：一是新时期律师事业应“讲政治、履职责、促改革、重自律”，律师协会要健全完善自律管理各项工作举措，勇于举旗，“让律协挺在前面”，真正做到行业自律；二是要充分发挥律师协会会长的作用，会长领导协会，协会各工



广东省副省长李春生、广东省司法厅厅长曾祥陆、深圳市委副书记李华楠、深圳市委常委田夫、深圳市委副书记徐文海、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虎善、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林昌炽等同志陪同调研。

作机构切实履职，发扬奉献精神，用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律师的尊重，建设广大律师真正的“娘家”；三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律师自身要承担起维护国家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应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思维，积极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做有温度的社会法律人。

张军部长寄望深圳律师业要充分发挥特区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锐意改革创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积极作为，为律师体制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



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之路

文 / 深圳市律师协会一带一路及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

近年来，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较快，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涉外服务领域日益拓展，服务质量逐步提升，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正当权益、促进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当前涉外法律服务业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如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不完善，政策措施不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参与国际律师组织的涉外律师人数较少，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比较匮乏。

随着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应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挑战的需要，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道路仍十分漫长。

关于涉外法律服务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要点着手实施并推动：

一、设立政府专项基金

地方政府可设立涉外法律服务投资发展基金，即政府机构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的形式设立，引导并支持促进涉外法律服务国际化的各类产业项目。例如，地方政府可以专项基金为基础，采用会员制的形式建立国际化法律服务专业协会，吸引律师事务所及个人律师入会成为协会会员，根据入会律所的不同规模收取相应的会费，并与政府专项基金一起构成政府对涉外法律服务的支持鼓励资金。

二、搭建法律服务国际化信息平台

搭建法律服务国际化信息平台，建立健全专业国际法律人才及法律权威索引的信息库（例如国际化人才、英文法律数据库），为搜索法律国际专业人才、国际法律信息及权威索引提供工具资源。

三、举办国际研讨会、专业讲座

例如由地方政府、地方律师协会主办或协办，与国外律师协会或国际律师组织联合举办国际法律研讨会，邀请更多的中国涉外律师与会并针对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与国际律师进行研讨交流。另外，聘请专业机构及国际专业人才举办专门讲座及培训，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领域。

四、建立激励及表彰国际化法律服务人才机制

设立专项奖学金，支持法律专业人才前往海外培训机构、海外法律协会等进行培训或交流，鼓励在海外取得学位和获得外国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回国就业或创业。

总而言之，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律协等机构的通力合作，为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构建出一个更为完善、有效且具备充分经济基础的平台，不仅帮助新一代年轻律师能投入到涉外法律服务的建设当中，同样也调动中生代律师参与涉外法律服务的积极性，为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的人才储备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尚任重而道远。

粤内登字B11277号



出版日期 2017年10月

编委会主任 林昌炽
编委会成员 章成 蔡华 杨道 尹成刚 曾迈 江定航 韩俊 汪腾锋
主编 汪腾锋
执行主编 王红 陈伟
栏目编辑 周争锋 陈伟 杨新发 舒笑 陈旭绯 颜宇丹
本期责任编辑 王文超
编辑 刘峰 贺鹏 王颖
美编 谭洁莹 岑均权
电话 0755—83025789 83025881
传真 0755—83025177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0楼
邮政编码 518048
电子信箱 shenzhenlawyers@163.com

目录 CONTENTS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S P4-12

- 4 十届律协三年工作规划出炉，明确108项任务
- 5 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三年工作规划

热点 | HOTSPOT P13-26

- 13 涉外法律服务迎来发展新机遇
- 14 海外投资失败失利的32大原因
- 19 内地法院涉港家事纠纷法律适用之谬误
- 22 涉外刑事案件的法律实务要点
- 24 涉港公证法律业务实务简析



P43



P45

论道 | DISCOVERY P27-30

- 27 防、预、辩、险——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中的四字法宝

实务 | PRACTICE P31-36

- 31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实务的思考
- 35 精细化、高标准，诉讼服务未来之路

拍案 | CASE AND EXAMPLES P37-41

- 37 表见代理在房价飙升情形下的一个真实案例评析

- 40 租赁合同纠纷中出租人自力救济权探讨

人物 | PROFILE P42-45

- 42 播种公平正义，一直在路上

律协动态 | INFORMATION P46-48

- 46 律协动态



十届律协三年工作规划出炉，明确108项任务

编者按

十届律协上任以来，兑现竞选承诺，秉持为协会立标杆，为行业树正气的信念为全市律师谋福祉。9月19日下午，市律协十届四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三年工作规划》，明确本届理事会任期内的工作任务及目标。工作规划涵盖了律师维权、自律规范、业务拓展、人才培养、涉外发展、对外合作、品牌建设、行业文化、会员福利等十五个板块共108项任务，在延续传承以往工作的同时，提出了大量的创新、务实举措。

突出业务发展与人才发展双轮驱动

本届理事会将规划设立深圳律师学院、建立涉外法律服务基地，努力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推出一批业务研究成果。理事会还拟建立深圳法律服务目录库，逐步建立可复制、可操作的法律服务标准化体系。在各区开展巡回专题讲座，增开律师专项培训等，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覆盖面。

突出律师维权和自律规范齐抓共管

本届理事会拟编撰《深圳律师维权手册》、在各区设立维权工作站、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及协会各委员会的大维权格局，充实行业维权力量，并通过与两级检法系统全面签订合作备忘录，逐项解决律师执业中的难题。同时，组建行业纪律专员队伍、开展各类执业风险防范活动，构建完善的行业自律规范机制。

突出文化软实力与品牌硬实力同步提升

拟提炼深圳律师文化理念、开展各类文化建设活动，重塑律师职业荣誉感，展示深圳律师业发展成就。品牌建设方面，将引导和支持专业精品所建设、举办及鼓励支持律所承办大型业务论坛、努力推出各区工作特色、深入开展志愿团服务、加强协会四大宣传平台建设，重点在树立律所品牌、论坛品牌、行业宣传品牌、区属律师服务品牌、公益法律服务品牌等方面下功夫。

突出会员福利与会员便利齐头并进

拟建立团购车险、机票酒店预订协议价等律师福利项目；联合市司法局为律所开发OA办公系统，实现律所案件冲突审查、客户管理等功能于一体；打造会员综合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年审、培训、维权、救助等各类会员业务网上办理；力争推动与相关部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网上预约会见、立案、阅卷、联系法官、案件关联、判例推送等系列功能。

突出服务大局与争取政府扶持协调发展

将积极引导律师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担任党委政府及企业法律顾问、参与检法遴选委员会工作等，广泛参与深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发挥好律师职能作用。同时，将力争推动政府加强对深圳律师业的政策、经费、人才等综合配套扶持，推动设立公职辩护人制度，力争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突出内部促进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

理事会把108项任务逐一细化分解到了对口委员会，落实责任机构，并形成不定期在会长会、理事会上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的自我促进机制。同时还将主动接受监事会和全市律师监督，每月按会长工作团队、专门委员会（理事）、专业委员会、区律师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五个责任主体公布履职动态，切实强化目标管理和责任落实，确保工作实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律师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深圳律师行业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方向迈进，为法治深圳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工作目标

本届理事会在“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下，通过民主管理、科学决策、行业推动，使全市律师执业环境得以改善和优化，律师队伍职业素养进一步增强，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执业行为更加规范，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协会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行业福利体系进一步完善，深圳律师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三、具体工作措施

（一）以“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建设为抓手，制度维权与个案维权并举，切实优化律师执业环境

1. 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推进《深圳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修订，以立法促进行业发展，推动法治深圳建设。（责任机构：曾迈副会长牵头，尹成刚副会长、杨道副会长及各委员会协助，律师条例推动修订工作小组具体落实）

2. 加强“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建设，畅通律师维权渠道，建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反应机制，发挥维权专线和邮箱的作用。（责任机构：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

3. 编撰《律师维权工作手册》，为律师维护权益提供操作指引。（责任机构：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

4. 维权工作向基层延伸，设立各区维权工作中心，实行“两代表一委员”、协会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以及市、区维权工作中心“联通、联合、联动”机制，形成“行业大维权”格局。（责任机构：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

5. 建立律师异地维权互助协作机制，加强与各地律协之间的跨区域维权合作。（责任机构：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

6. 加大个案维权工作力度，对律师个案维权申请做到有案必接、积极作为，同时抓住行业普遍问题及典型个案，集中力量，重

深圳市律师协会 第十届理事会三年工作规划

为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推进深圳律师行业快速稳健发展，现制定深圳律师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三年（2017年4月-2020年3月）工作规划。

点突破。（责任机构：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牵头，各委员会配合）

7. 组建律师维权志愿团，选拔一批有经验、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律师担任志愿团成员，充实行业维权力量。（责任机构：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

（二）紧抓业务创新与业务发展主线，努力推出一批深圳律师业实务成果

8. 完成30个专业委员会组建，签订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目标责任书》，科学制定专业委员会绩效考核体系和奖惩机制，及时在网站公布专业委活动计及排行榜。（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9. 编撰《法律服务产品目录》，以相关专业领域为编撰体系，梳理所属业务领域内的法律服务产品，并逐步制定相关法律服务产品的规范性操作指引。（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牵头，各委员会落实）

10. 出版不少于15本深圳律师实务专著，展示深圳律师专业成果。（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11. 鼓励专业委员会发布业务资讯，与深圳律师分享本专业领域的业务研究、新法解读、典型案例等成果。（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牵头，各专业委员会落实）

12. 适时举办“智能时代律师业创新发展高端论坛”，为智能工具在律师业的运用、律师与电商的跨界合作、律所信息化建设提供新思路。（责任机构：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13. 开展“深圳律师业务创新大赛”，推动全市业务创新产品研发，征集和推广一批法律服务新模式和业务新方案。（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三）借助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提升律师行业服务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14. 成立律师行业信息化工作小组。推动与司法行政部门、公检法系统以及工商、国土、社保等政府部门系统互联互通，搭建网上“律师诉讼服务中心”，升级“律师一卡通”，提高应用覆盖面，努力推动律师网上预约会见、立案、阅卷、联系法

官、开庭自动排期、案件关联、判例推送等系列功能。（责任机构：杨道副会长牵头，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具体落实，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共同参与，各委员会配合）

15. 着力开展“智慧律协”建设，以“让信息多跑路、会员少跑腿”为宗旨，依托深圳律师之家APP和深圳律师网，打造会员综合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年度考核、实习、培训、维权、救助、纪律等各类会员业务（项目申报、资料提交等）网上办理。（责任机构：秘书处具体负责，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协助）

16. 全力推进“数据律协”建设，做好现有各系统平台的数据对接，出具含行业规模、律所类型、人员结构、业务类型等行业数据的可视化业态分析报告，为行业发展提供支撑。（责任机构：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牵头，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共同参与）

17. 推进行业信用平台建设，推动完成行业信息、行政信息、案例数据库、法律服务平台相对接，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拓展律师业务，同时为法律服务需求提供精准指引。（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18. 联合市司法局开发律师事务所OA办公系统，免费提供给全市律师事务所使用，实现案件冲突审查、律师团队及客户管理、案件归档管理等功能，提高律所运营效率。（责任机构：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

19. 完善律师“云学院”建设，深化与其他省、市律协的合作，建立培训课件共享机制，打造律师网上继续教育平台。（责任机构：职业培训委员会）

（四）加强涉外业务研究、业务拓展和人才培养，推进深圳律师业国际化进程

20. 建立涉外法律服务业基地，制定战略规划，进行涉外业务研究、拓展、人才培养。（责任机构：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牵头，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前海律师工作委员会协助）

21. 推动在前海增设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改善联营所执业环境；吸引境外优质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鼓励本土律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责任机构：前海律师工作委员会、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

22. 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举办及鼓励支持律师事务所承办系列国际性业务论坛，打造深圳律师业的论坛品牌。（责任机构：前海律师工作委员会、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牵头，职业培训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协助）

23. 梳理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前海产业重点法律问题和商业模式，努力推出一批法律服务产品。（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牵头，前海律师工作委员会协助）

24. 主动参与前海立法创新、司法创新、金融创新、土地规划和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等工作，推动深圳律师业创新发展。（责任机构：前海律师工作委员会）

25. 主动与前海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有关单位沟通对接，通过合作互访、宣讲等带动前海法律服务消费。（责任机构：前海律师工作委员会）

26. 搭建“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律师协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梳理、研究沿线国家地区的法律等内容，为深圳律师拓展国际法律业务创造条件。（责任机构：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牵头，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协助）

27. 务实开展与境外发达国家的法律机构的交流合作，重点加强与港澳台、新加坡、欧美等地律师会、仲裁机构等法律机构的合作，探索将国外先进

的诉讼、仲裁培训课程引入深圳。（责任机构：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

28. 健全完善优秀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推荐机制，推荐优秀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进入国际法律组织、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专家机构、评审机构、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国际仲裁机构。（责任机构：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

29. 举办“涉外法律实务”培训，加强与国内知名的涉外仲裁机构、司法审判机构以及法学院联系和合作，参与国内知名的“国际”性法律论坛活动，培养深圳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涉外法律服务需要。（责任机构：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职业培训委员会）

30. 筹建深圳“海归”律师联谊会，扩充涉外律师人才库；汇聚行业内有国外法律学习、从业经历或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同时吸纳和发展有志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做好行业涉外律师人才储备。（责任机构：国际与港澳台工作委员会）

（五）广泛开展法律人合作交流，全面深化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31. 成立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加强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

32. 推动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国安局、律协联席会议召开，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定期沟通保障律师执业权益情况。（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

33. 争取实现与市、区两级公检法等机构全面签署合作备忘录，落实备忘录，努力解决律师在执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牵头，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共同参与）

34. 举办法律职业共同体论坛，开展业务交流专题研讨等活动，为检察官、法官、警官、律师搭建公开、透明的沟通交流平台。（责任机构：法律职

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牵头，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共同参与）

35. 与法律共同体成员共同举办演讲比赛、辩论赛、文体活动等，共同提升素质，展示形象，弘扬法治精神。（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牵头，文体与福利工作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共同参与）

36. 以司法机关“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推动设立“律师之家”、“律师调解工作室”，完善功能，为律师办理案件、联系办案人员、开展工作争取便利。（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牵头，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共同参与）

37. 积极参与司法体制改革，组织律师参与检法遴选委员会工作。推荐优秀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

38. 推动建立检法评议监督制度（律师部分），以律师角度对法官、检察官及裁判文书等进行评价，以评促建，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责任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

（六）推动政府将律师服务纳入高端服务业或创新产业范畴, 加强政策、经费、人才等综合配套扶持

39. 推动律师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落地，制定和出台扶持法律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在人才引进及落户、律所购置或租赁办公用房、律所纳税返还、参与政府主办的大型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等方面给予支持。（责任机构：理事会）

40. 努力推动政府搭建法律服务业与深圳支柱产业对接平台，实现法律服务业与金融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外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深度融合，支持和孵化高端法律服务产品。（责任机构：理事会）

41. 推动政府设立律师业专项扶持资金，推动扶持一批国际化、品牌化的律师事务所，培养、引进一批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责任机构：理事会）

42. 推动政府建立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

现政府法律顾问全覆盖，促进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充分发挥律师在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为律师参与涉诉涉访、调解、社区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给予相匹配的经费保障。（责任机构：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

43. 组建财税工作小组，推动政府部门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律师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措施，通过特区立法等形式建立符合深圳律师行业特点的合理税赋和税务征收方式，争取税收返还、奖励等优惠政策。（责任机构：财务与资产管理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44. 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立专项工作小组，推动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发挥律师专业作用，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责任机构：蔡华副会长牵头，公设辩护人制度建设工作小组具体落实，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共同参与）

45. 加强与人大、政府合作，继续发挥立法调研基地作用，承接立法调研项目，扩充立法专家库，培育和拓宽律师在立法、规章制定等方面的服务领域和范围。（责任机构：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法律职业共同体工作委员会、法治深圳促进委员会、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

（七）优化全覆盖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一支高素质律师队伍

46. 设立深圳律师学院，整合外部优势资源，以实践教学、业务研究、课题调研、实习培训、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多重优势战略叠加，提速深圳律师业人才发展。（责任机构：章成副会长牵头，汪腾锋副会长协助）

47. 开展深圳律师业人才规模、层次结构、业务类型、分布状况、培育机制等摸底调查，形成《深圳律师业人才发展调研报告》，推动行业人才建设。（责任机构：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

48. 适时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律师法治论坛”，为深圳律师提升技能、整合资源、更好地参与湾区经济发展搭建平台。（责任机构：青年律师

工作委员会牵头，职业培训委员会协助）

49. 举办“法律大讲堂”，重点打造两个项目。其一：举办大型现场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解前沿法律课题。其二：开展经验分享课堂，邀请资深律师向青年律师分享经验和执业技能。（责任机构：职业培训委员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

50. 举办“青年律师研修班”、“行业后备人才训练营”、“团队带头人能力提升训练营”、“中小型律所主任管理研修班”、“律师事务所主任及合伙人培训班”、“律师讲师专项训练营”等专项培训班，培养一批律师拔尖人才和律所管理人才。（责任机构：职业培训委员会与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

51. 到各区开展巡回专题培训，每年选定一至两个培训主题，举办不少于20场巡回讲座。（责任机构：职业培训委员会牵头，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协助）

52. 成立公司与公职律师工作委员会。搭建社会、公职、公司律师沟通平台，促进三类律师业务交流合作，形成各司其职、优势互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深圳法律服务业发展（责任机构：公司与公职律师工作委员会）

53. 调研并撰写《青年律师生存状况调研报告》；适时开展“传道传业传承”、青年律师形象秀、“中国未来合伙人”、业务专题学习沙龙、微视频大赛、户外联谊等多种形式活动，为深圳律师业储备人才。（责任机构：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

（八）发挥大所行业引领作用，推动中小所专业化，做强做优律师事务所，打造深圳品牌

54. 举办“深圳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和发展论坛”，关注律所管理和发展模式、发展趋势、分配机制、业务发展和律所团队建设等问题，促进律所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建设。（责任机构：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

55. 搭建中小型律所联合办公平台，制定中小所发展的标准化体系。（责任机构：中小型律师事务

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

56. 引导和支持专业精品所建设，树立发展典范和标杆，打造样板，提供借鉴。（责任机构：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牵头，律师文化建设与表彰工作委员会配合）

57. 发挥行政主管联谊会作用，开展档案管理等业务培训，举办第二期高级研修班，培养律所专职管理人员队伍。（责任机构：秘书处）

58. 定期举办证照管理员、财务人员培训，规范律师事务所运作。（责任机构：秘书处）

（九）加强律师执业监督指导，构建完善的行业自律规范机制

59. 结合全国律协最新规定，修订协会纪律工作规则及处分细则，优化行业自律机制。（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规章制度工作委员会）

60. 加强“投诉受理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中心职责，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衔接，建立有效的工作流程，促进与司法行政机关快速联动。（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1. 推动建立“统一投诉、收案、办理窗口”，规范投诉案件办理流程。（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2. 组建律师事务所纪律专员队伍，开展“职业道德及执业纪律”培训，制定纪律宣讲课题题库，分别围绕全市律师、全市律所主任、律所专员开展“百人宣讲团，千场微课堂”等培训活动。（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3. 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的规范指导和监督检查，重点针对投诉较多、受处分较多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执业风险筛查，及时提出风险隐患防范措施及纠正意见。（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4. 梳理一批违规风险点，以宣传册或微电影等生动展示形式，为全市律师规范执业提供借鉴。

（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5. 定期召开重大群体性、敏感案件办理指导工作座谈会，对律师代理的重大敏感案件实行全程指导与跟进，并建立案件指导专家库。（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6. 适时开展“纪律标兵律师事务所”评选活动，倡导争做行业廉洁自律表率 and 良好职业道德模范的良好风尚。（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律师文化建设与表彰工作委员会）

67. 加强“听证评议团”建设，将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引入评议团，强化社会监督力度，提高行业公信力。（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8. 视条件举办“律师行业自律管理工作论坛”，探索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

69. 明确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合伙人的管理职责，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建立事务所负责人监管约谈制度,加强对本所律师执业行为的日常管理。（责任机构：会员违规行为调查工作委员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工作委员会、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

（十）以协会成立30周年为契机，展示深圳律师业发展成就，树立深圳律师品牌

70. 成立“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工作小组，制作30周年纪录片、举行30周年纪念典礼暨文艺演出、开展30周年行业突出贡献表彰及致敬老律师活动、制作深圳市律师协会宣传片、举办深圳律师业发展论坛、开展深圳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和优秀律师评选等系列活动。（责任机构：理事会）

71. 加强《深圳律师》杂志、深圳律师网、深圳律协微信公众号、深圳律师APP四大宣传平台建

设，完善相关工作制度。（责任机构：宣传工作委员会）

72. 加强与媒体的联络、沟通与合作，举办常态化的媒体联谊活动，选拔推荐律师担任《法律讲堂》《律师来了》及《法观天下》等法治栏目嘉宾。（责任机构：宣传工作委员会）

73. 编撰出版《深圳律师年鉴（2017—2020）》，收录本届协会工作及律师业发展资料。（责任机构：宣传工作委员会）

74. 组建深圳律师业信息员队伍，收集、掌握、挖掘行业动态，树立深圳律师专业、务实的社会形象。（责任机构：宣传工作委员会）

75. 以“5.15、9.25、12.4”为契机，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展示律师正面职业形象。（责任机构：宣传工作委员会）

76. 建立健全“深圳市优秀律师”和“深圳市优秀律师事务所”评价量化体系；探索建立律协工作团队个人及所在律所参加协会组织的评优活动回避制度。（责任机构：律师文化建设与表彰工作委员会、规章制度工作委员会）

77. 提炼代表深圳律师文化的标语、口号，作为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开展律师事务所文化建设示范、开展重塑律师职业荣誉感、举办主题征文等活动。（责任机构：律师文化建设与表彰工作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

78. 加强与相关行业组织、企业商会等的联系和沟通，加强与社会组织管理局、仲裁机构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的交流，探索与深圳市主要的行业协会（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编制联系手册，建立常态的联络工作机制，拓宽律师法律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责任机构：公共关系工作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

（十一）遵循“以人为本、服务律师、凝聚人心”宗旨，将协会打造成“律师之家”

79. 协会每季度分区召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代表座谈会，收集、倾听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发展诉求，推动问题解决。（责任机构：会员与律师代表

工作委员会、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

80. 设立“会员接待日”，每月第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下午，由会长统筹安排协会工作团队接待预约的会员，听取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增强协会与会员的沟通与互动。（责任机构：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81. 每月公布履职情况。分为会长工作团队、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5个责任主体，在深圳律师网和代表工作群公布履职日志及工作动态，接受律师监督。（责任机构：各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区律师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82. 完善会员福利体系，推动实施律师执业保险、健康体检、争取团购车险、机票酒店预订协议价等福利项目，编制《会员福利手册》，为会员谋福祉。（责任机构：文体与福利工作委员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

83. 开展行业发展调研并形成《深圳律师业发展白皮书》，为更好开展会员服务和推动行业发展提供基础素材。（责任机构：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牵头，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职业培训委员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老律师工作委员会、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公益委员会及工作规划中有调研项目的委员会配合）

84. 开展女律师生存状况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举办关心女律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时间规划、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培训；引导女律师参与微马、合唱团、体育比赛等活动。（责任机构：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85. 开展老律师生存状况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开展适合老律师特点的文艺体育或者兴趣活动，组建老律师联谊群。（责任机构：老律师工作委员会）

86. 恢复组建深圳律师艺术团，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责任机构：文体与福利工作委员会）

（十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
87. 面向社会发布《深圳律师社会责任报告》，

全面展示深圳律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责任机构：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

88. 成立“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团”，加强与其他女性社会组织和团体的交流和合作，展示深圳女律师风采。（责任机构：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89. 持续推进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配合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做好顾问培训、经验交流等工作，建立考核奖励办法，加强指导和监督。（责任机构：公益委员会）

90. 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建立法律援助专家律师库，参与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责任机构：公益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

91. 持续开展“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职责和使命。（责任机构：公益委员会）

92. 深入开展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律师志愿团、深圳市图书馆公益法律服务团、“深圳市妇联志愿律师团”、“深圳市中小微企业律师服务团”等法律服务志愿团值班工作，推荐优秀律师参与市消费者委员会并组建律师志愿团，打造深圳律师公益法律服务系列品牌。（责任机构：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公益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业务创新与发展委员会、公共关系工作委员会）

93. 建立公益律师队伍，针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军人军属等群体提供公益法律服务。（责任机构：公益委员会）

94. 积极推动律师普法讲师团开展以案说法宣传活动，组织律师参与普法宣传工作，弘扬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精神。（责任机构：宣传工作委员会）

95. 积极拓展律师在各党派的各级组织、各行业协会等新的参政议政领域；鼓励优秀律师就国计民生热点问题以信息等形式向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献良策；开展优秀建议、议案、提案评选活动并跟进报道；组织、协调“两代表一委员”的议（提）案和建议，推动解决行业发展掣肘问题。（责任机构：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律师文化建设与表彰工作委员会）

（十三）完善实习人员考核管理机制，确保合格人才

进入律师队伍

96. 组织律师事务所指导律师培训，落实律师事务所及指导律师对实习人员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及素养、专业技能等方面的指导责任，切实提高实习成效。（责任机构：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

97. 加强党组织对实习人员中党员的领导，从申报实习到实习考核全流程引入党建工作，强化实习人员中党员的组织观念，提升实习人员整体政治素质。（责任机构：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

98. 加强实习人员实习期间的动态管理，开展律师事务所实习管理工作实地检查，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及指导律师的实习管理工作督导，进一步肃清挂靠实习、假实习、律师事务所违规安排实习等现象。（责任机构：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

99. 完善和加强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遴选、培训、考核制度，引入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作为实习面试考官，提高考核水平和公信力。（责任机构：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

100. 组建实习人员集中培训讲师团，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授课老师，同时对集中培训授课老师进行授课效果评估，实行末位淘汰制。增加集中培训实务课程，提高实习人员培训工作成效。（责任机构：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

101. 制定和完善港澳台籍、公职、公司、法律援助类、有法官、检察官工作经历等实习人员的实习和考核办法，对专业化实习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责任机构：实习人员工作委员会）

（十四）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和秘书处建设，强化律师协会行业自律管理职责

102. 推进《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修订工作。（责任机构：杨道副会长牵头，章成、曾迈副会长协助，章程修改工作小组具体落实）

103. 制定《深圳市律师协会行业规则制定办法》，全面梳理协会各项规章制度，完善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加强各委员会建设，充分发挥委员会在促进业务交流、推进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协会工作活

力。（责任机构：规章制度工作委员会）

104. 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制定预决算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办法、招投标管理制度，建立协会商品、服务采购库。（责任机构：财务与资产管理委员会）

105. 开展会费标准调研，探索科学合理的团体会员、个人会员会费调整方案，为深圳律师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责任机构：财务与资产管理委员会牵头，会员与律师代表工作委员会、律师事务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与指导委员会）

106. 完善秘书处机构设置，明确秘书处工作职责，合理设置工作岗位，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责任机构：理事会）

（十五）加强与市、区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将行业自律管理与服务功能向基层延伸

107. 配合市司法局，组织召开“深圳区属律师管理工作交流会”。争取各区司法局支持，努力推动各区出台差异化的律师业扶持政策和措施，在人才培养、住房补贴、承接政府项目等方面为区属律师发展创造条件。（责任机构：理事会、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

108. 带领区属律师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协助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参与规范性文件的起草、重大项目投资的法律可行性论证、大型活动法律框架设计等方面发挥作用，举办具有影响力的主题论坛和活动，推出各区工作特色和品牌项目。（责任机构：各区律师工作委员会）

本工作规划（2017年4月—2020年3月）是本届理事会任期内的工作任务，也是市律协各会长、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区律师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开展工作的目标和依据。

理事会将按照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上级律协要求，适时开展其他工作；执行过程中如有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理事会将作出调整和修正。

本工作规划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编前语

涉外法律服务迎来发展新机遇

文 / 本刊编辑部

中国的涉外法律制度历史悠久，有实物可考的秦朝法律中就有了关于“外”的规定，内外有别的法律规定为后世立法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到了唐朝，《唐律疏议》中出现了关于内外法律适用的原则性规定。中国涉外法律不仅在实体规则方面不断丰富，更有了关于抽象的法律适用原则，这是同时期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唐之后的宋辽金元明清各律，基本上都是在涉外立法中作了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规定。除成文立法以外，各个朝代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了各种涉外纠纷的解决机制并且因时因地地灵活处理了各种涉外纠纷，在涉外法律问题的处理上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方法。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涉外法律制度。

当然，涉外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密切相联。我国从明中叶以后，便开始了漫长的闭关锁国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中华民族仍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涉外法律难以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发展。1978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正是这一重大的社会改革，给中国原有的法律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才使涉外法律有了发展的机遇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外开放政策，长期保持不变。”这充分说明对外开放已经明确地成为执政党基本路线的一个组成内容，并且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它除了关连着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命运之外，还在于它的具体内容已上升为国家法律形式。从我国宪法到具体的各项制度和法规，对外开放

的精神已经像血脉一样遍布于国家的肌体和制度的骨架之中。

对外开放国策的确立，使涉外法律拥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和物质文化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互动，中国的外商投资体系和境外投资体系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增长了14.7%，这是连续数年的快速增长，位居世界第三位。从吸引外资来看，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增长了5.6%，已连续24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

而2016年数据仍然惊人，2016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813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2016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DI）同比增长44.1%，达到1701.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且已超过同期实际使用外资（FDI）规模。

到了2017年年初，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全面提出了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主要措施。

中国跨境投资的发展代表了中国融入世界、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意愿和担当。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迫切需要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上，不能没有成熟的中国涉外律师。本期《深圳律师》杂志将与您共同探讨新的时代背景下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之道。

海外投资失败失利的32大原因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比例数仍然偏低，失败失利数量占主流，教训非常惨痛，但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仍然非常强烈。因此，找出失败失利原因，找出避免同类失误的解决办法，是助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转败为胜的关键。

文 / 高洋律师 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

项目调研不充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不例外。当前，绝大多数企业境外投资缺乏充分、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及论证，存在很强的主观盲目性。

法律调研不充分

项目前期法律调研对项目成功顺利与否十分重要。中企在对外投资前务必进行全面深入的法律调研，及时发现法律障碍，从而有效避免投资损失。对于法律调研的范围，笔者建议应至少包括所投国家国内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税务协定以及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条约等。

商业调研不充分

商业调研不充分主要是指对影响投资项目成功的各种商业条件是否具备没有穷尽或判断失误，从而导致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失利。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建议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前全面仔细罗列影响投资成功的各种商业条件并进行实地考察、详细科学分析论证，不可大意，更不能遗漏。

社会环境调研不充分

投资项目所在的社会环境也非常重要，企业境外投资也需要评估项目所在地的各项社会条件。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前进行法律、商业、社会环境等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极其重要。建议中国企业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困难意识，在自己全面调研的同时聘请专业的国际国内商业和法律等中介机构进行全方

位的深度可行性研究，对影响项目成功的全部必要条件和要素进行罗列并重点分析评估，否则，一旦投资失败，后悔莫及。

尽职调查不充分

中国企业走出去，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非常重要。尽职调查至少涵盖法律、财务、税务等方面。此外，尽职调查，一定要中国的律师和财务顾问参与，以避免外国律师等中介机构为了挣到服务费而有促成交易的倾向。此外，中国企业所聘当地律师或会计师与目标公司或合作伙伴均在境外当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熟人等私人关系，很难查明，一旦具有某种紧密关系，中国企业所投项目就非常危险。

政府审批风险估计不足

中海油185亿美元并购优尼科因涉嫌威胁美国国防安全未能顺利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而撤回要约；华为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未能通过CFIUS国家安全审查而弃购；紫光股份拟37.75亿美元收购西部数据15%股份，在确定CFIUS将介入审查后，紫光股份放弃收购。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可能触发政府审批时，要仔细评估相关政府审批风险，应对能否顺利通过政府审批有充分分析和准备，特别是，在可能触及政府审批时，要主动申报。

商业判断失误

因商业判断失误而导致境外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特别是石油、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商品在前些年处于市场高位时的收购项目，近年来普遍因市场低迷出现群体性亏损。

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出现巨亏，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石油价格的走势把握不准，出现商业判断失误；中铝128.5亿美元收购力拓9%股份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力拓股价大跌，加上汇率损失，中铝巨额亏损750亿人民币；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30亿美元缩水一半和兖州煤业收购澳洲煤矿在2013年出现亏损近50亿元人民币。

建议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准确把握所属行业在经济周期或生命周期，不宜对行业趋势做乐观判断。

论导向错误

2002年，紫金、中铝等中国企业正积极参与蒙古奥优陶勒盖铜金矿项目开发当中时，国内媒体为了突出报道主题，在措辞方面很不注意，这让蒙古觉得奥优陶勒盖项目背后还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导致中企退出。

建议中国企业对所投的政治敏感性境外项目进行适当保密，避免新闻媒体过早报道。

中企围标，内部竞争

在海外并购和国际工程承包中，经常出现多家中国企业围猎同一标的，结果导致标的收购价格被抬高，或工程承包项目低价竞争，导致中标后收益不佳，甚至亏损。

尽管商务部已有对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工程投标项目需要取得商务部许可以及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的规定，投资主体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仍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并取得确认函等所谓“路条”制度，但这方面的确需要进一步建立中国企业境外有序竞争的相关制度，避免中国企业在境外自相残杀而无利可图。

国际工程低价竞标

中国海外投资波兰A2公路，投标价竟然只有波兰政府预估成本的一半。中标后，又未能成功调整价格，导致彻底失败。

建议中国企业抛弃志在必得、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错误思维。

不聘请国内律师或聘请境外律师不专业

民生银行1.29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银行颗粒无收，原民生银行行长洪琦后来总结说：“首先是他们的政治性太强。投行跟你说，律师跟你说，人家是想把业务做成，成不成是你的事，他要拿手续费。”这反映出，在聘请境外律师等中介机构的同时应该聘请国内律师等中介机构。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同时聘请专业的境内、境外律师，且不可为省小钱，而吃大亏。

合作伙伴选择不当

优质的合作伙伴至少应诚实守信、口碑良好、实力雄厚且不存在其他潜在风险。选好合作伙伴后，还需正确把握、处理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笔者建议在中方控股的情况下至少应做到：1.不能让合作伙伴对合资公司形成控制权；2.不聘任合作伙伴推荐的律师或会计师；3.学会单独或与合作伙伴一起与当地政府和机构沟通交流，而不是在这方面完全依靠合作伙伴。

被中间人绑架或误导

中国企业获取海外项目，往往有中间人牵线搭桥。中间人为收取佣金或类似报酬，都有夸大项目收益，促成交易的心理。中国企业因未能正确把握和处理与中间人关系，而导致投资失败的项目案例也不少。

笔者建议：1.对中间人提供的信息都要进行验证，不可轻易相信，一旦发现中间人提供的信息不实，立刻终止合作；2.不能让中间人掌控投资项目，要直接与交易对方或者当地政府打交道；3.中间人报酬，争取根据项目节点和经营业绩确定并分期支付，切忌一次性支付；4.佣金协议或类似协议中明确中间人的义务，并设定完成时间节点以及逾期违约责任。

政府信用风险

墨西哥政府无理由取消中国高铁项目，并进而又以财政紧缩为由宣布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即是政府信用风险的案例。

建议中国企业投资政府类项目时，充分考虑政府信用风险，并注意投保境外投资保险。

政府换届风险

在境外民选政府国家，政府换届对企业所投项目往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上届政府支持，下届政府不一定支持。一个党派支持，另一个党派往往要反对。

建议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避开在政府换届前实施投资。此外，应密切关注政府选举，并把握可能组阁党派对所投项目的态度。

征收或国有化

中国平安投资欧洲富通集团后，因应对金融危机，比利时政府将富通银行从富通集团剥离，构成对富通集团银行资产的征收，并将其75%的股权以114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法国巴黎银行。为此，中国平安提起了国际仲裁。

笔者建议在法治环境不好的国家进行大项目投资时，与当地有实力的优质合作伙伴合资，同时建议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

国家关系紧张升级

2014年5月，中国与越南因南海争端升级，引发了越南民众对在越中资企业打砸抢烧事件，中资企业遭受重大损失。

因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密切关注中国与该国的双边关系，并对双边关系紧张或可能出现紧张的国家谨慎投资，否则很可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失败失利。

此外，对于坚持到上述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建议通过与该国关系紧密的国家转投并聘用一到两名转投国家的国民担任投资所在国中资企业的高管。这样，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中资企业在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家之间关系紧张时可能带来的损失。

战争

2011年我国投资利比亚的50多个大型项目因利比亚战争而无法履行。据估计，损失至少100亿美元。

因此，建议中国企业尽量不要前去政局不稳定或被联合国或美国制裁的国家等存在潜在战争风险的国家去投资。如果去投资，要履行适当的法律手续并注意购买投资保险。此外，对于没有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建议通过有与投资东道国有投资协定的国家转投。

居民抗议

开滦股份在加拿大投资盖森煤矿，也因当地个别居民的抗议而非一帆风顺。虽然最终得以解决，但延误了工期。

中电投73亿投资缅甸密松水电站和墨西哥坎昆龙城项目也因遭受当地居民抗议而被叫停。

建议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时，要注意广泛倾听当地居民对项目的意见，抛弃搞定政府就搞定一切的错误思维。另外，在实施重大海外项目时，要选择合资方式，此方面的法律风险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嫁给当地伙伴承担。

环保问题

中电投投资缅甸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叫停，墨西哥坎昆龙城1.8亿美元投资涉嫌未履行环保手续被开55万美元罚单并被叫停，都是因环保风险而失败失利的例证。

中国企业走出去，某种程度上是对外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但中国企业应加强环保风险评估并确保环保方面合法合规。此外，中国企业在实际投资前，建议广泛听取当地居民对项目的看法，并举行合法听证，在取得各级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也要征得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

整合不成功

整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企业试图按照国内的思维去改变、影响被收购公司的制度

和文化。跨国收购整合是不同企业文化和制度的融合，其整合初期，最容易发生两种文化和制度的交锋和对抗。

建议中国企业在跨国收购整合时，不要下猛药，而要循序渐进或者根据情况保持被收购企业原有企业文化和制度不变。

贪图便宜收购亏损公司

近年来，部分中国企业收购一些境外亏损公司，以为捡了便宜，但多数企业陷入债务和亏损泥潭，后悔不及。

2016年年底，中国肉企上海梅林宣布完成对新西兰银蕨农场（SFF）的收购，以2.67亿纽币现金购买了银蕨农场50%的股份。时隔半年，新西兰天维网报道，该新西兰企业计划关闭南岛Fairton工厂，并裁员370个工作岗位。

建议中国企业不收购境外亏损公司，或者在收购前一定要非常谨慎，不打无把握之仗。

税务问题

中海油服2008年收购的COSL Drilling Europe AS，在2013年11月被挪威税务机关要求补交2006年、2007年的所得税约1.75亿挪威克朗。因此跨国收购，税务遗漏问题不容忽视。

对于此类风险，建议在收购协议明确由外方全部承担。

违约金偏低问题

中铝公司收购力拓，力拓毁约并支付1.95亿美元分手费。而中铝又对为其提供并购融资贷款的4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违约，中铝要赔偿给4大银行的违约金要远远高于此数。

建议在并购协议中，努力争取足以覆盖中方损失的违约金金额。

劳工问题

上汽并购双龙，因员工罢工直接诱发韩国法院介入，最后宣布双龙进入破产程序。首钢收购秘鲁铁矿

后，也经常面临当地工人要求涨薪罢工的困扰。

境外多数国家，工人都有强大的工会，企业与工会打交道与国内不同。中国企业需要对境外劳工问题特别重视。

所投国家经济衰退或崩溃、汇率大幅贬值

近年来，巴西和俄罗斯货币汇率大幅贬值，经济衰退明显，导致中国在巴西和俄罗斯投资的企业亏损较为严重。此外，近年来，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几乎崩溃，也导致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普遍性亏损。

因此，海外投资，需要密切关注投资所在国经济形势及长期走势和汇率变动风险。

传染病疫情

对于传染病高发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应尽量避免前往。比如，近年来肆虐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不仅危害了当地人员的健康，也一定程度上重创了当地经济，当然对当地中资企业也带来了不利影响。此外，非洲也是疟疾的高发地，拉美是寨卡病毒的高发区，因此，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建议做好足够的防疫准备。

未融入当地风险

2017年2月，杭州百艺服装纺织制衣(缅甸)有限公司发生中方管理人员遭到缅甸工人暴力冲击事件。

建议中资企业及其中国员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当地，为当地所接纳并和平友好相处，充当中外交往的民间使者。

知识产权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注重专利和商标提前布局，经常发生商标被抢注事件，康佳、海信、联想等知名品牌都有着不得不“买回”商标，或者对簿公堂，或者抛弃原有商标重新创立品牌的教训。境外中资企业在境外雇佣当地员工，委托开发或合作开发的过程中，也很容易泄露商业秘密。

建议中国企业提前做好知识产权布局，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

内控失效

2004年底，中航油因总经理陈久霖在石油期权和期货投机中判断失误，累积亏损超过5.5亿美元。中航油“折戟沉沙”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跨国经营必须要建立内控和相互制衡的风险控制机制，而不能内控失效。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应建立科学有效的治理架构，既要防止被外方控制，也要防止中方个人专断。

不注重经营合规

据中兴公告及相关资料透露，中兴在未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向伊朗出口美国管制产品，妨碍司法，以及制造重大不实陈述，被罚共计约82亿人民币，导致中兴巨亏，这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敲响了警钟。

建议中国企业在设立或收购当地公司后，立刻聘请当地专业的律师，在当地专业律师的建议下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切忌为了节省费用而不聘当地专业律师，否则代价极其惨重。

以中国思维处理境外投资问题

这方面表现很多，笔者在本文部分总结如下：

中国企业往往认为搞定了外国政府就搞定了一切，但获得政府支持，并不等于可以不按照当地法律规则办事；中国工程企业在国内善于通过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方式承揽工程并获取利润，但在国外往往行不通，进而发生亏损；此外，中国企业收购境外公司后，也不能因为成为境外企业的投资者或老板而任性；还有，中国企业认为给加班费，员工会加班，这在很多境外国家根本行不通。

建议中国企业入乡随俗，学习并按照当地思维和风俗习惯处理境外投资事宜，否则会引起当地抵触、反对，甚至处罚，遭受损失。

谈判签约风险

境外投资风险多数可以通过设计商务合同条款

加以规避、转嫁以及控制，因此谈判签约工作非常重要。此外，企业特别需要把可行性研究和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约定到合同中，明确责任归属。

笔者建议，中国企业要高度重视谈判签约工作。一定要同时聘请国内和国外的专业律师，同时最好聘请既精通英语，又精通当地语言的中国专业律师参与其中。

合同履行失误

据某律师介绍，其服务的一个客户投资巴西一个工程项目，客户竟然没有根据合同及时索赔，其飞到巴西常驻两个月才把索赔资料整理。

因此，中资企业需要安排精通英文或其他外语合同的专业商务人员不时翻阅项目合同文件，确保合同全面履约，避免发生违约责任或出现履约事故。

团队薄弱风险

境外投资能否成功关键是人，众多境外失败失利案例，都与企业境外投资团队力量薄弱直接关联。

当前，中方驻外人员外语能力总体偏低，还不能完全适应境外投资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中资企业人员急需提高法律英语、工程英语等专业英语以及非英语国家的当地语言。

笔者认为，企业境外投资在加强内部团队建设的同时，更需要聘请专业的境内境外律师和会计师以及其他服务机构协同作战。

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上述列明的三十二项教训之外，还存在着海外投资架构设计不合理（比如境外企业层级超过财税[2009]125号文规定的三层，且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例外范畴）、滥用双边税务协定，股份代持，不注重履行当地社会责任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此，囿于篇幅，不再具体分析。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教训很多，也很深刻，值得总结，值得中国企业借鉴，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早日转败为胜。

内地法院涉港家事纠纷法律适用之谬误

文 / 龚楚律师 广东驰纳律师事务所



笔者最近发现，内地法院在审理涉港家事案件（婚姻家庭财产纠纷）时，频繁援引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已婚者地位条例》，并普遍按照该《条例》作出判决，不支持起诉方要求分割港人配偶个人名下内地财产的诉讼请求。与此同时，大量的家事律师（婚姻律师）也据此《条例》做出法律分析，这样大量的案例和律师文章形成了一个氛围，好像援引《已婚者地位条例》来审理涉港家庭财产纠纷是正确的、唯一的途径。

笔者认为无论当前大陆法院的做法还是当前大陆律师的法律分析，或多或少失之偏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已婚者地位条例》简评

《已婚者地位条例》于1971年港英时代颁布，共17条，其立法精神是保护已婚女性、破除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强调即使已婚妇女或未成年也有相当权利，等等。“夫妻分别财产制”这个英美法系特别是英格兰地区的家事法大原则，看上去很专业很权威，所有人都视若司法标杆，其实深究下去，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通览《已婚者地位条例》，并没有看到明确提及“夫妻分别财产制”字样，其只是在保护已婚女性的精神下，进行了行为能力和财产权利的授予。《已婚者地位条例》第3条授予已婚女性持有财产的能力；第4条授予已婚女性处置财产的权利；第5条授予已婚女性对第三人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第6条授予已婚女性对配偶提出财产诉讼的权利；第7条授予已婚女性对配偶管有财产提出诉讼的权利；第8条对第6、7条进行了延伸；第9条规定“若丈夫或妻子以金钱或有价事物分担改善土地财产或非土地财产的状况，…其变卖所得的款项…，除非夫妻之间有明订或默示的相反协议，否则曾分担的丈夫或妻子须被视为因分担而取得一份或一份加大的实益权益，份额于当时可能已由双方协议决定，若无此协议，则在丈夫或妻子的实益权益是否存在或份额多寡的问题产生时(不论是产生于夫妻之间的法律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中)，由聆讯法庭以其认为在一切情况下均属公正者为准。”

《已婚者地位条例》的全部17条中，除以上第3–9条之外，其它条款与内地涉港案件关系较弱，暂且不表。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已婚者地位条例》并不像大陆法官或大陆律师认识的那样，僵硬地把夫妻财产分开，而是侧重于维护已婚女性的独立平等地位和财产权益。它并不指向说，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比如房产）就是该方个人所有。《已婚者地位条例》甚至还规定：在夫妻没有财产协议（无论婚前或婚后）的情形下，公正原则是判案基准。

香港司法实践改革下的夫妻财产制度演变

我国大陆法院在涉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判决，大多单一援用《已婚者地位条例》，简单重复得可怕。实际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家事立法纷繁复杂，以下都只是部分：《婚姻诉讼条例》、《婚姻条例》、《婚生地位条例》、《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婚姻诉讼规则》、《婚姻制度改革规例》、《已婚者地位条例》等等。最近20年，香港司法实践有3个方面的发展驱动力：1.英国法的发展；2.大陆司法实践；3.本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这3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香港家事法院日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多个判决即使引用英格兰法和英格兰判例，也最终实质上认同了夫妻财产平等分配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检索香港法院最近十几年的判决，可以发现：基本上所有的离婚夫妻财产分割的案例，都按照《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进行裁判，而不是《已婚者地位条例》。

香港法院判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民事上诉案件编号：上诉案件2007年第91号（LKW对DD案）》

判决书第30项写到：“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香港法例第192章）第II部的条文规定……根据第4条，法庭可以作出定期付款或整笔付款的命令。根据第6条，法庭可命令将财产转让、或作出授产安排的命令和更改授产安排的命令。根据第6A条，法庭亦有权命令将财产出售。”

判决书第76项写到：“本席认为，按平等原则，妻子应获得共同婚姻资产的一半，即港币2,682,500.00元。本案中，并无任何相反因素足以成为偏离平均分配原则的理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婚姻诉讼案件编号2000年第8827宗》

判决书第228项写到：“本席是须要考虑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7条的规

定。”

判决书第251项写到：“本席在考虑过以上所有因素后，本席信纳双方都已没有任何的入息或工作能力。丈夫没有任何的资产；但妻子则仍持有2,788,829.66元的净资产，而这些资产则是源于双方的联名银行账户。本席认为一个合理的分配是与讼双方各占这资产的一半。因此，本席认为丈夫应从妻子的总资产中得到1,400,000元。”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婚姻诉讼案件编号2004年第3174宗》

判决书第25项写到：“根据香港法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4条，法庭可以作出定期付款或整笔付款的命令。”

判决书第27项写到：“终审法院在LKW v DD（2010）13 HKCFAR 537案中，就应该如何考虑该条例第7（1）条的附属济助的申请，确立了4个基本原则和5个步骤的处理方法。该4个基本原则分别是：1.该条例第7条的目的是要达致公平的资产分配；2.排除一切性别或角色的歧视，例如，不应偏袒赚钱养家的一方而对理家和照顾子女的一方有偏见；3.考虑分配是否符合「平均分割准则」（yardstick of equal division），若要偏离这准则，必须有充分和清楚表达的理由才应该不依从这准则；4.排除细致入微地审查往事。

判决书第28项写到：“终审法院定下的5个步骤依次为：1.确定资产；2.评估双方的经济需要；3.决定运用分享原则；4.考虑有没有充分理由不作出平均分配；5.决定分配结果。”

判决书第77项写到：“综观上述案例，本席认为丈夫的行为是严重的「诉讼不当行为」，但并没有影响到在本案中应会剩余的份额，不属于「婚姻不当行为」，故本席不会因此而偏离「平均分配」的原则。”

评析

香港作为前英殖民地，法律传统相同。

英国1973年的Watchel v Watchel案，考虑丈夫

日后要支付子女抚养费，因而适当多分丈夫财产，名为“三分之一原则”；后英国1982年Preston v Preston案确立了“合理要求原则”，并经过本港1990年的C v C案采用了“合理要求原则”；之后 Lord Nicholls在2001年White v White案中确立了“平等分配准则”。因此，英国自2001年后改用了“平等分配准则”，而香港高等法院2008年在

“LKW对DD案”中摒弃了将近20年的“合理要求”原则，采纳了“平等分配原则”。平等分配原则是什么意思？英国或香港的“平等分配”跟中国大陆的“夫妻共有”，有什么实际上的差别？其实没有。实际上我们再提夫妻分别财产制或夫妻共同财产制，只是一种法理学上的话语，对实际审判并无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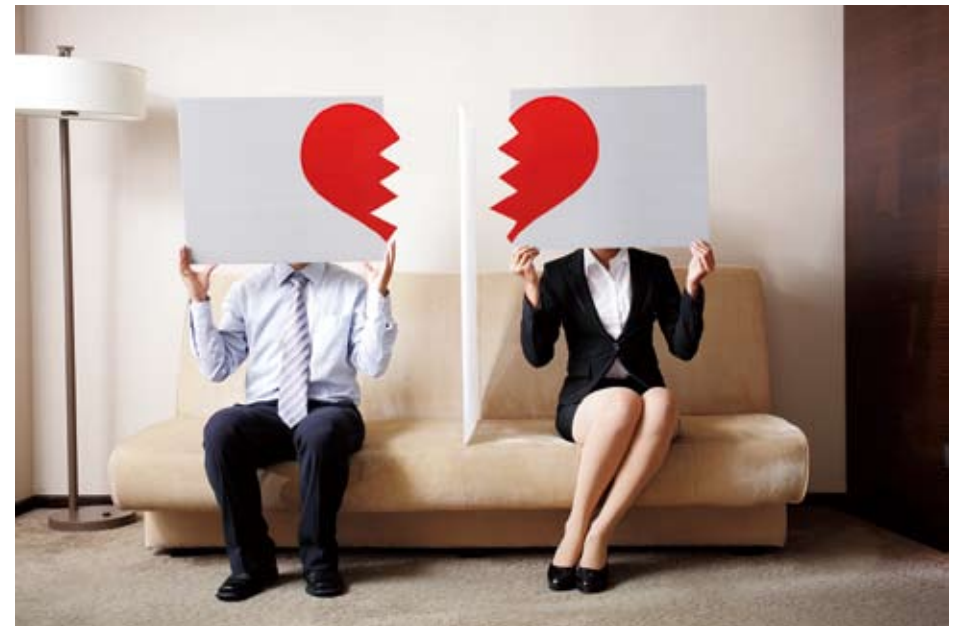
判例一“LKW对DD案”很令人惊奇的一点是：原被告之间存在夫妻财产协议。但即使如此，考虑到具体案情，终审法院依然按照平等原则，一人一半进行了分割。

近年大量香港法院家事财产案件均如此判决，可得出结论：

1. 香港法院目前已经不援引《已婚者地位条例》写作判决书，而是都引用《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结合其它相关法律，甚至重点借鉴和引用外国法律和判例（如英国法和英国法院判例）。

2. 香港特别行政区2001年前后实践中已经普遍遵循夫妻财产“平均分割准则”，除非有证据来提供充分理由偏离这一准则（比如夫妻财产协议，等等）；香港高等法院在“LKW对DD案”只是总结了本港彼时近10年的实际，做出了结论性判例而已。

3. 大陆法院没有认识到香港司法实践的具体情



况，即无论夫妻对财产如何约定或无论夫妻有无签订财产协议，其审判实践也不是僵硬地划分为“谁名下就是谁的财产”，没有认识到香港法院的审判实践是随着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公平合理的判决。

笔者认为，即使大陆法院一味只坚持《已婚者地位条例》的适用性，也应当知道该条例主要强调女方财产地位，强调了公平原则，是出于保护妇女弱势群体的立法导向。这种立法导向的利益应当归弱势一方的女方。一般涉港夫妻财产纠纷，多为男方到大陆经商置业，随之发生婚外情，婚外同居生子。在香港的妻子有苦难言，奋力起诉已经很难，再僵化援引过时法律或判例，后果是坏的。即使按照《已婚者地位条例》，香港的妻子除专属财产之外，应当仍有权分割合理的夫妻财产部分。一味以财产登记在丈夫名下，就判决驳回妻子诉讼请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这也是对香港法院审判实践的曲解和误读，属于错误引用香港法。

信息滞后导致内地法院用错误的涉外法来裁决涉外婚姻财产纠纷，将造成大面积的错案，后果严重。笔者建议大陆法院的法官和婚姻律师应及时刷新最新国外司法实践信息，帮助内地法院和律师学习和认识最新外国司法实践和判例。

涉外刑事案件的法律实务要点

文／潘效辉律师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何为涉外刑事案件？涉外刑事案件是指行为发生地、结果发生地、行为的实施主体或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涉外因素的刑事案件。近年来，随着外籍人士入境人数总量的增长，外国人犯罪案件时有发生。2013年至今，笔者所在的涉外刑事辩护律师刑事部承办了十余起涉外国人刑事案件，涉及的罪名也较为分散，散见于刑法分则各个章节中。

涉外案件的几项主要罪名

走私毒品罪

为走私毒品犯罪辩护时，建议关注走私犯罪的既未遂问题、主从犯的认定以及自首情节的认定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涉及法定量刑情节。走私的既未遂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需要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另外，会见涉案人员时应仔细梳理案件的过程与细节，捕捉可能有利于犯罪人的情况。例如，笔者于2015年在办理一起走私毒品案件时，在与涉案人交谈中，注意到其曾在机场开包检查期间，经安检人员许可后至洗手间又返回的细节，提出自首情节，并被法院认定。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此类涉嫌人多为外籍华人，少数为外籍人士。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具体包括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骗取出境证件罪及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在办理该罪名时，须注意罪名的牵连，根据涉案人员的行为甄别其行为性质。

逃汇罪

此罪名往往由公司涉嫌犯罪而引起，以单位犯罪为主，外国人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追究责任。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外汇数额特别巨大，一般由外管局处理后移送相关侦查机关。笔者在2014年承办的一家中东公司涉逃汇案件中，该案后经法院认定涉案1157万美元，由上海外汇管理局移送上海市公安局。在行政机关开展调查时，应尽早听取专业意见和建议，预判案件走向，防止事件发展变得无法控制，在承办前述案件时，因为沟通得当，笔者代理的其公司代表人，在侦查阶段即被取保，相对公司其他人员在强制措施上更为轻缓。

其他罪名

涉外案件的其他罪名还涉及信用卡诈骗、猥亵妇女、抢劫、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经营等罪名。

涉外刑事办理的工作常识

外籍人士的管辖、羁押领事探视

对于外籍人士犯罪行为，上海各区公安机关均有管辖权，各级法院

也有权审理外国人犯罪案件。目前实行集中羁押并统一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就探视而言，各国领事对于本国涉嫌刑事追究人员都会安排定期的探视，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探视是固定的工作机制，每月探视一次，探视内容主要是关注其生活及健康状况等。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分别由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陪同。领事馆人员探视后一般会给家属写一封探视的简短报告。

如捎带资料的话，需经司法人员检查后方可交给外籍人士，但是如果是外语资料的话，一般都会被拒绝。如病人需要特殊的药物，应与看守所联系，征得看守所医生同意后交给医生。如笔者在2013年代理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该案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4全国十大刑事案件”），因涉案人健康问题，曾处理过此类特殊情况。

法律适用的特殊规定

基于身份上的差异，司法机关出台了一些特殊性的规定，实行区别对待。例如，根据上海市检察院和公安局的下发的文件，对于外国人轻微犯罪案件，具有法定情节的如未成年人、在校留学生等，或者主观恶性较小，初犯或偶然犯及过失犯罪，到案后有悔罪表现的及其他一些法定条件者，可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实施行政处罚，并可限制出境或驱逐出境。

另外，外国人享有与其国家驻华大使馆、领事馆联系，请求检察机关提供翻译的权利等。同时，对于外国人案件的报备，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在案件中可以索取有关办案材料，使馆人员可以探视，以及重大涉外案件的报道危害国家安全的涉外案件的新闻报道，均有特殊的规定。了解这些规定，有利于案件的沟通和推进。

与家属沟通的注意事项

确定家属交流的一个点，这对律师而言非常重要。有的案件中，嫌疑人的家属与朋友往往都会向律师了解案情，在这种情形下，同一种事情往往需要重复多遍，这种沟通在效率上显然是不高的。建



议委托方确定一个交流人员，所有的交流都与该人对接，可以提高沟通的效率。

做好工作记录及工作量化。与国外刑事律师相比，国内刑事律师往往关注于办案本身，但对过程有所忽略，忽略客户的感受和满意度。英美国家的客户对于这方面的要求较高。

由于司法制度的差异，外籍人士的家属往往对于中国的法律法规有很多不解，涉外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做好解释工作。

涉外刑案辩护的特殊性

涉外的刑事业务，既要求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上的专业性，又对律师运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能力提出要求，要求律师尽量使用外语作为工作语言，同时又非常熟练运用涉及犯罪与构成要件量刑的专业术语，这对于深入沟通案件、了解案件细节、把握当事人的意思，会是相当大的帮助。例如，在2014年一起中东地区某国籍人非法经营案中，笔者应邀为其案件中的一名当事人会见提供翻译服务，对此感触很深。当然，相对于外语使用而止，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而言，更应关注的是律师的专业能力。

在工作中，需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交流的情形：平时案件进展情况交流，及时向外国人家属通报会见情况，与领事馆工作人员信函来往，案件证据材料的阅读，重大死刑案件中代外国人向其国家司法部门申请司法援助的申请材料申报及信件和电话沟通。个别特殊案件还需要与国外驻中国的使馆人员汇报沟通情况，争取外交支持等等。

涉港公证法律业务实务简析

文 / 王偕林律师 雅尔德曾陈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

香港公证业务的基本概念

香港公证业务，其准确称谓应为“由香港的委托公证人出具之证明文书”，其作用类似于内地的公证员公证，但行使权力的机构、依据的法律基础、流程等均不同于内地公证员公证。

香港公证业务应由“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公司Association of China-Appointed Attesting Officers Limited”（为便于理解及检索，涉及香港的机构名称均以繁体中文字以及英文表述，下同）之协会会员，即具备香港法例第159章《法律执业者条例》认可之法律从业员资格，并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任为中国委托公证人（以下简称“委托公证人”）来进行承办，此类委托公证人均应为香港的执业律师且在任期内必须参加协会成为协会会员。

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公证文件一般为以下几类：《证明书》——委托公证人签署证明公证文书内提及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委托书》——申请人在委托公证人面签签署委托书，委托公证人签署见证；《声明书》——申请人在委托公证人面签根据

香港的《宣誓及声明条例》对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声明及签署，此时委托公证人以香港执业律师身份监督及签署。

其所包含的公证业务内容一般为以下事项：申请同内地人士结婚声明书；申请内地亲属来港声明书、继承（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申请办理夫妻关系（结婚）声明书、申请回内地收养子女声明书、内地人士出国读书经济担保声明书、个人委托书、赠与书、公司委托（授权）书、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书、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等。

香港公证业务的基本流程如下：1.申请人选定在协会名称中的具备资格之委托公证人并进行委托；2.申请人亲自到律师事务所办理文件的签署；3.委托公证人基于香港法律核查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并起草及制作公证文书；4.委托公证人将公证文书正副本（正本副本均为原件，其区别在于首页以蓝色方章加盖了正本、副本章）交“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公司）进行盖章转递；5.“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进行盖章后，正本交还委托公证人，副本直接转递到内地的公证文书使用机关。

香港公司办理公证业务的实务提示

此类公证业务较多的场合是在国内涉诉业务中，原被告一方或双方为香港公司的。

首先，需要向法院提交一套香港公司公证文件，证明该公司的真实存续，明确该公司在本次案件中的授权签字人，明确该公司对于在本次案件中的授权代理律师。

其次是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用于证明香港公司的真实合法存续，其内容主要会涵盖：1.证明书正文（由委托公证人负责起草）；2.公司注册证书，简称CI，显示的是公司繁体中文以及英文名称；3.公司成立时间，其中应注意的是，如该公司曾经进行过更名，则会有一份“公司更改名称注册登记证”，显示其更名的事实；4.商业登记证，简称BR，显示该公司的英文注册地址；5.周年申报表，简称AR1，显示的是该公司较为详细的资料，包括其托管的秘书公司之地址，公司董事名称，公司股权结构等，一般作为主体资格公证的文件使用时，不涵盖该公司的公司章程。

最后是公司委托（授权）书、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书，用于证明香港公司委托处理本次事务的具体签字人以及代理律师，其中一般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书的形式涵盖了需要做出的委托授权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1.委托公司的某位具体个人作为公司的授权签字人，代为签字并接收本次事务的文件，并代公司就该事务做出相应意思表示，由于香港公司并无法定代表人这一设置，因此需要该内容；2.委托律师代为处理诉讼/非诉事宜，建议在标准授权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多涵盖内容，避免产生重复公证增加成本，如能够在委托时即明确是否进行财产保全，是否继续代理二审、强制执行环节，则可以将前述授权内容一并列入其中，但仍应注意商业登记证的有效期限的问题。

公司的董事需要亲自至香港的委托公证人所在律师行面签该等文件。一般在前述文件中，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书的小部分内容由委托公证人进行起草，大部分内容是由办理内地法律事务的律师出具相应授权书然后直接照搬到证明书中，因此内地律师应对于授权书内容进行严格把关，不能产生错漏。

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涵盖授权内容的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书，组成一套完整的香港公司主体及授权公证文件，在由委托公证人负责起草的证明文书正文中，其也需要明确该等公证文件是在内地哪个地方用于什么用途，如可能涉及到广东省内多个地点，则可列为“广东省内诉讼使用”，如涉及到查档、诉讼、执行等多项业务并涉及多个省份的，可较为详细列明。

香港居民办理人身关系公证业务的提示

本所处理此类公证业务较多用于香港居民（本文特指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购买住宅，香港居民国内房产继承（内地居民继承香港居民国内房产/香港居民继承香港居民国内房产），香港居民国内房产赠与（亲属关系为双方均是香港居民或受赠方为内地居民两种情况）。

香港居民在内地购买住宅，根据现行有效之“限外令”规定，在符合购买条件下，其在国内范围内仅能购买一套自用商品房，因此，香港居民在购买住宅时，需要向不动产登记机关出具相应的承诺函，承诺其在国内范围仅有该已购买的一套住宅，而在深圳本地，如需要向税务部门申请首套住宅的购置税费减免的，则需要由香港委托公证人出具相应的亲属关系声明书（香港没有户口簿的设置），用于证明其家庭成员在国内也仅有该一套住宅，该等证明文书的内容，一般包含证明购房者的婚否以及配偶/子女情况，以申请人在香港委托公证人面前进行宣誓出具声明书的形式来出具。

香港居民国内房产继承，内地居民继承香港居民国内房产/香港居民继承香港居民国内房产这两种情况的办理流程基本一致，一般分为办理公证文书

（香港及内地）、办理营业税免征事项（房产所属地地税局）、至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本文以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为例）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二手房商品房转移登记）手续，简要分析如下：

1. 继承人首先须先行在香港委托通有委托公证人资格之香港律师出具《亲属关系及遗嘱状况声明书》。

一般情况下该声明书应对被继承人的夫妻关系（包括缔结时间及地点）、子女情况（包括婚生、非婚生、养继关系等情况）、遗嘱遗赠订立情况等事项进行公证。该声明书办理时长约5-7日。

2. 在领取《亲属关系及遗嘱状况声明书》后，继承人须持该声明书至国内公证机关办理继承权公证、放弃继承权公证（非必须、如有其他合法继承人）。

如有意委托他人（如律师）办理后续办税、转移登记等手续，亦须办理授权委托书公证。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建议涵盖领取公证文件、申请税费减免、办理房产过户、领取房地产证等内容。

3. 申请税费减免，继承人在领取上述公证文书后，可以至标的房产所在地的地税局办理免征营业税手续，办理免税事项无需缴费。

所需材料为继承人（即纳税人）与被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往来内地通行证“回乡证”），亲属关系及遗嘱状况声

明书、继承权公证书、放弃继承权公证书（非必须）、授权委托书公证书（如有）、原房地产证。上述材料于办事窗口除继承权公证书收取原件外其余验原件交复印件。纳税人无需先行填表，窗口工作人员实时打印《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及《纳税人减免税（费）申请表》，经纳税人或委托人签署后领取税务事项通知书，在7个工作日后（不含申请当日与领证当日，即申请后第8个工作日）领取办理结果（即获批后的《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税务事项通知书》）后，免征营业税事项办理完毕。

4. 免税事项办理结束后，后续按照公开手续办理房产继承的转移登记即可。

香港居民国内房产赠与，同样需要具备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出具《亲属关系声明书》。一般情况下该声明书应对夫妻关系（包括缔结时间及地点）、子女情况（包括婚生、非婚生、养继等情况）等进行公证。在领取《亲属关系声明书》后，赠与人和受赠人须持该声明书至国内公证机关办理赠与合同公证书。后续申请税费减免程序以及过户程序与办理继承事项基本一致。

如牵涉到同一标的房产既有待继承又有待赠与的情况，则建议将两类授权内容综合起来办理授权委托书公证并一同办理继承和赠与的公证。前述基于继承目的办理的《亲属关系及遗嘱状况声明书》亦可在办理继承及赠与两项程序时重复使用，无需再另行出具单独的《亲属关系声明书》。

综上，随着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蓬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落实，涉港公证法律业务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作为内地律师对于此类业务流程有所了解和掌握，既有利于客户服务的提升，也有利于与香港律师的顺畅合作及交流。



防、预、辩、险—— 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中的四字法宝

文 / 刘平凡律师 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经济活动广泛而频繁，特别是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及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各种新的经济形式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经济市场，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新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不断出现。这在商事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如由于金融、房地产、中介服务、高科技等专业市场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各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相伴而生，这些领域已然成了犯罪的重灾区。近两年，商事犯罪总量不断攀升，涉案金额也在不断增大。商事领域犯罪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在商事犯罪领域，刑辩律师不能只在企业已经涉嫌犯罪后才发挥作用，而应该在企业建立、运营直至终结的整个过程中，全程为企业及企业家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从源头上杜绝商事犯罪，在商事行为的各个环节、阶段扮演好自己角色。据此，笔者结合自身执业经历，总结了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的四个要诀：防、预、辩、险。

建立初期“防”为先

长期以来，无论是企业还是刑辩律师都只重视刑事辩护，而不注意企业刑事风险防控的非诉讼业务。而商事领域的犯罪恰巧具有超强的专业性与隐蔽性，这要求刑辩律师要在企业建立初期为企业建立一套专业的商事犯罪风险防控体系，变被动辩护为主动防范，充分发挥刑辩律师在“防”方面的作用。

从目前的刑法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有137个罪名涉及商事犯罪，涉及企业融资、经营、结算等多个核心环节。尽管法律对商事犯罪的规定已

经颇为详尽，但大多数企业家的重心仍在于企业经营，而忽视刑事风险防范，不能有效避免刑事犯罪风险。主要表现为：经营者藐视法律，主动行为或者消极放任行为以致犯罪；不了解《刑法》体系针对商事犯罪方面的规定，在不知不觉中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由于法律规定不明晰、界限混乱，导致企业或企业家犯罪；企业内部的防控制度侧重民事，轻刑事；公司律师及法务人员刑事法律意识及诉讼经验欠缺。此外，法律的僵硬性和滞后性也是造成企业犯罪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那么，如何有效防范企业商事犯罪？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

一方面，企业人要主动提高法律意识。上至高管，下到员工，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遵守规则，做到“心中有法、敬畏法律”。马克思有一段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我们不能让商人不追逐利益，但也不能纵容其只盯着利润，心中无法。所以，心中有法、敬畏法律才是防范刑事风险的关键，要树立“不能犯罪、不敢犯罪”的思想底线。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企业人，可以没有法律知识，但绝不能没有法律意识。

另一方面，专业律师团队要协助企业建立并实施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机制。一是可以在企业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经营模式等方面提供法律支持，这是在源头上杜绝企业商事犯罪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二是通过对法律和案例的研究，对商事犯罪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这是有效规避刑事法律风险的前提。三是对刑事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并帮助企业制定规避刑事法律风险的规划，对企业的高管和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四是在企业经营运行的核心环节做好防控工作，为企业提供精准、专业的法律支持。比如企业的融资行为可能涉及到的罪名有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集资诈骗罪等；结算过程可能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具体经营行为又可能涉及合同诈骗罪、串通投标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罪名。对此，律师要把可能涉及到的犯罪解释清楚，并根据法律知识为其提供可行方案供其参考，有效地杜绝企业商事犯罪的发生。

《人民的名义》中有一句台词：“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在去往监狱的路上”。这句台词并不夸张，恰恰反映出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之大。作为专业的刑辩律

师，要为企业和企业家负起责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负起责任，为我们的企业家修建一条回家的路。

运营阶段“预”为主

在企业建立初期，由于诸多原因影响了刑事风险的预见性，或因运营的多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企业经营中出现了诸多漏洞，这需要律师从企业运营的几个核心风险点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挥“预”字作用。

一、财务管理风险。企业的财务管理仍然处于“十大风险”之首，是企业刑事风险的第一高发点，其主要原因在于：1. 这一领域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流动，为从事、分管或者主管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实施侵吞、窃取、骗取和挪用企业财产、资金的行为提供了客观基础；2.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各方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大权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为企业高管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现实可能；3. 企业内部的财务制度不健全也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财务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罪名也比较多，主要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

二、企业融资风险。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为此企业经常要借助借贷、证券发行、证券交易等融资渠道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这一融资过程中容易触犯的罪名很多，最为突出的、发案率最高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e租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结算风险。结算环节的突出特点就是与纳税有关，依法纳税是企业要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和应尽的社会义务。在履行这类义务过程中，企业为追求利益，可能会有偷、漏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因为对刑法的不了解，经营者会简单的认为偷、漏税只是违规（行政违法）行为，以为通过“关系”或者补缴税款就可解决。殊不知这些行为一旦越过“红线”就会触犯刑法，接受严格的刑罚。

企业运营中的刑事法律风险远不只上述的几种情况，因此更需要律师为企业诊断，针对关键问题对症下药。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定期为企业进行刑事风险评估，尽可能找出企业存在的刑事风险点，形成评估报告，并提供解决方案供企业管理者参考决策。

第二，开发层级管理的内部框架模式，对极易发生刑事法律风险的业务，可从权力授予、报告呈送、限时审批、责任审计、业务考评等几个程序方面，建立刑事犯罪风险分散机制。这样可将由于权力引发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散，将风险点化繁为简，以便预防和解决。

第三，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和财务流程。建立律师监督服务机制，发挥律师专业职能，让律师成为企业服务者的同时赋予其一定监督权力，随时为企业把脉，确保企业合法、合规运营。

涉嫌犯罪“辩”为宗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预防、补漏后，有些企业仍然会触碰或者已在不知不觉的触碰了法律、法规的“红线”，走上犯罪道路。此时，刑辩律师就要尽最大可能为企业做到有效辩护，帮助企业“起死回生”。

如何做到有效辩护？笔者认为，刑辩律师首先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要在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商事犯罪的研究要有针对性，根据大数据分析，得出商事犯罪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社会影响高的罪名，从而对这类罪名及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分析。

例如，我们可将商事犯罪进行大体分类。根据刑法修正案（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系列补充规定，商事犯罪共137个罪名，占刑法法定罪名总数的四分之一。这137个罪名大体可分为六大类：（一）金融类犯罪三十四个，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为主；（二）公司类商事职务犯罪十八个，以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为主；

（三）公司类违反社会责任犯罪二十五个，以危害公司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环境资源罪为主；（四）公司类不当营业犯罪二十三个，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扰乱市场秩序罪为主；（五）涉税类犯罪十四个，以危害税收征管罪为主；（六）妨害监管类二十三个，以走私罪为主。

对于上述六大类罪名，虽暂无一个有效全覆盖的辩护模型，但所涉及的所有罪名中，仅有少数占较高的发案率。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为例，据笔者统计，自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深圳市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二十五项罪中，除去非商事犯罪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及假币类犯罪，涉及商事犯罪的罪名绝大部分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掌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典型案例、风险点、相关判决及辩护要点，应当是商事犯罪辩护专业律师的必备技能。

其次，律师要将相关法律、法规吃透，更重要的是与行政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大部分商事犯罪是以行政违法为先决条件的，比如逃税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这要求刑辩律师要做“万金油”（专指某个商事犯罪领域的“万金油”），除了掌握这个罪名在刑事层面上的相关规定，还要掌握行政层面上的规定，更要将企业的内部架构和运营模式吃透。要熟悉企业运营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方式、做了哪些事情、企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整个运营过程中起什么作用，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等情况。只有做好了这个领域的“万金油”，刑辩律师才能够判断出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从而找到辩点，做到有效的辩护，才能做好企业的“救命医生”。

最后，规范化的刑事辩护是有效辩护的不二法宝。《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当前的很多律师还在奉行“老三套”的辩护方法，这明显没有履行好刑法规定的义务。对于商事犯罪的有效辩护要从立案开始，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各个

阶段，做到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相结合，特别要在程序上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商事犯罪标准化辩护流程中，尤其要重视审前辩护。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的案件只占0.08%，而一审前作出撤销案件、不批捕、不起诉等案件占全部案件的15.15%，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审前辩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律师执业要避“险”

陈瑞华教授曾说道：“辩护律师本应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明明是维护别人权利的这样一种职业，自身却要时刻面临受到追诉的风险。”可见，刑事辩护律师不仅要懂得如何为当事人的自由及合法权利而辩，更要清楚如何规避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道路上的种种荆棘。

刑辩律师执业中存在的风险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来自社会黑恶势力的纠缠威胁；二是当事人的不解或迁怒；三是因工作的失误或过失而导致的法律风险；四是其他方面不可预见的原因。而作为商事犯罪的辩护律师，所面临的风险却更为险峻。

首先，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所引发的律师执业风险。根据全国律协的调查统计，从本条颁布至今至少有近200名律师因此被起诉，虽然绝大多数最后都不予定罪，却给刑辩律师群体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就商事领域的刑事法律服务而言，商事犯罪往往涉及到民刑交叉、行刑交叉的情况，由于证据种类繁多，信息量巨大，律师在从事防控、辩护工作时，往往很难在海量的证据中保证每一份证据的真实性。而委托人可能将伪造的证据掺杂其中，使律师最后卷入制造伪证的漩涡之中。面对这类风险，律师坚持做到处处留痕迹。例如，在每一次谈话和履行职责的过程都做好记录，把提交的证据及材料做好存档工作，向当事人做详尽和清楚地阐释并由当事人签字后存档，以确保将来出现风险时做到有据可依。

其次，涉嫌商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与一般暴力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区别显著，不再是“街头混混”，往往是一些“有钱、有势、有头脑”的高智商的嫌疑人。这类人往往比我们还懂得专业甚至法律知识，他们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往往会请律师从事一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甚至犯罪目的的行为，而律师却又没有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危险，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企业犯罪的帮助犯。

律师如何去避免这类风险呢？

笔者认为应以敬而远之、近而远之为原则，以礼相待，在给予必要尊重的同时，不提供具体的法律意见，不以任何形式参与此类企业的发展。但若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就需要认真仔细了解企业的情况，包括组织机构框架、运营模式等细节，同时将《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对比，找出风险点，帮助企业布防，做好工作日志并留下痕迹，在杜绝企业犯罪的同时也避免自身的风险。在接受委托为已经涉嫌犯罪的企业服务时，切忌在执业或办案过程中表现得过于武断，或在没有合法依据的前提下即为当事人作出任何判断或承诺。

最后，在商事犯罪过程中。很多当事人在从企业开始运营，再到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整个过程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行为系违法，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的掌握要比一般的律师还要深刻。实践工作中律师的失误往往表现在程序或形式上，实体上的错误往往都是因为方向性的错误造成的，或定性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这完全是由律师的专业水准和实践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化解这个风险的良方就是辩护律师必须要按规范化的流程办理案件、提供服务，将工作量化并留下痕迹，时刻具有风险意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商事犯罪中甚至还存在一种“别样”的风险：实践中发生了多起以追缴赃款的名义追缴律师费的情况，以律师费是非法所得为由，到律师事务所追缴，甚至直接扣缴律师费。因此，律师从事商事犯罪辩护工作，一定要“草木皆兵”，莫要将辛勤汗水“付诸东流”。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实务的思考

文 / 刘南筠律师 广东中熙（龙华）律师事务所

自2015年7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方案》实施以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试点工作已有两年。经过两年的试点，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种新类型，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从律师代理的角度值得我们就该新的案件类型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试点情况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和确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求积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根据这个要求，2015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出台，立法机关授权人民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的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2年；2015年7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开始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试点工作。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具体指导开展试点工作。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写入这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

试点期间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现实情况和主要特点

根据对试点期间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判决文书的检索发现，13个试点地区已办结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共189宗，其中北京和江苏没有案件；189宗中，只有2宗为检察院因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撤诉，1宗驳回检察院起诉，其他186宗都是被告败诉，被确认行政行为或不履职行为违法，判决责令履行相关职责。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189宗案件全部为一审判决，没有二审判决；

二、189宗案件中，只有12宗案件涉及行政行为违法，占比为6.3%，其他案件全部为不履行行政职权，占比为93.6%；

三、案件符合起诉条件的比率高，只有1宗被认为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被驳回起诉，占比为0.53%；

四、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较多，但是只有2宗案件撤诉，绝大部分案件仍然做出了确认被告不履职行为违法的判决；

五、不同地区对受案范围的理解仍存在差异，如贵州省有12宗对乡、镇政府在特定地点集中堆放生活垃圾的行为提起行政行为违法和要求履行清理职责的诉讼，均为判决被告违法并责令履责，而同样情况在吉林省被认为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驳回起诉。

综合以上几点可见，在全国已办结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只要被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基本上都

会面临败诉的结果，除非能够因为依法完全履行职责，或完全纠正了违法行为，公益诉讼人撤诉。而行政公益诉讼的类型主要是起诉不履行职责，并要求依法履行职责。

深圳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情况

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年深圳行政审判工作报告》来看，2016年全市有8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全部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其中有5宗对检察院在诉前程序中送达的检察建议有回复，有3宗对检察院在诉前程序中的检察建议没有回复。8宗案件均尚未判决。据了解，在案件起诉后，被诉行政机关都极为重视，积极采取各项整改措施。

与一般行政诉讼案件的差别

由于《行政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的内容尚未修订公布，目前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主要依据仍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因此，我们在办理此类行政诉讼案件的过程中，除了行政诉讼所依据的一般法律法规外，针对公益诉讼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请求、诉讼程序等问题，需要重点关注该《实施办法》。依据《实施办法》，我们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相对于一般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有范围限制。

试点期间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有范围限制，即仅限于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因此，为环保、水务、林业、国土等管理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应当要熟悉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处理。

案件的对抗性不如一般的行政诉讼案件，公益诉讼人的地位较一般行政诉讼的原告优渥。

作为公益诉讼人的检察机关，既然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本身也是法律监督部门，相对于作为一般行政诉讼原告的行政相对人，显然具有后者无可

比拟的优渥地位。因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常与被告一方不会产生激烈的对抗，作为被告一方的行政机关，往往更希望通过积极与公益诉讼人的沟通协调和积极整改来消化案件。而作为被告代理人的律师，在法庭上除了需要充分、清晰表达自己的抗辩理由，往往也需要注意表达的方式和分寸。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从已有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来看，很多案件中公益诉讼人对请求履行职责的诉讼请的表述并不非常清晰。例如只请求责令被告履行保护某项资源的职责，并未明确具体要求如何履责。而各位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标准也不大一致，少数法院要求公益诉讼人将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为如何履责，如责令对XXX侵占林地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XXX恢复林地用途等。但相当数量的法院对此并未有相关要求，甚至最终做出的判决也是较为笼统的要求“对XXX林地履行监管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受到了公益诉讼人地位特殊的影响。

诉前程序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对诉前程序中不作为的认定标准较一般行政不作为案件严格。

根据《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这就是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由此可见，诉前程序中的检察建议书发出后，需存在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职责，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或不履行职责行为使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时，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我们发现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对诉前程序中的不履责行为的认定标准较一般行政不作为案件严格。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大多数都会采取履责行为，但是否

完全履责、实际履责，是否存在履责不能，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可能都存在不同的理解，而我们发现从已有判例来看，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履责情况的审查较为严格。对于部分履行、未完全履行、表面履行的，通常都认定为未依法完全履行职责。例如在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诉被告十堰市郧阳区林业局未履行林业行政执法法定职责一案中，被告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已督促行政相对人在被毁林地上均补栽了苗木，但是公益诉讼人认为虽然补栽了苗木，但是不能说明已恢复林地功能。法院为此委托鉴定机构对被毁林地的生态恢复程度及生态恢复所需期限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造林时间、树种、苗木质量、造林密度、造林方式等符合林业造林相关技术要求，但在正常管护的情况下修复期限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达到郁闭要求。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尚未完全履行职责，应继续履行职责，通过持续有效的监管，促使被毁林地修复到《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范》所要求的标准。

行政公益诉讼以不作为案件为主要类型。

不作为案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只占有一定比重，而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不作为案件为主要的案件类型，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实际上也具有将行政违法行为转让为不作为行为的作用。这也是公益诉讼制度重在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履责，避免司法权过多、过早介入行政程序所决定的，因此在这一点上，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具有鲜明的特点。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争议问题的思考

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实务中，我们发现容易就以下两点发生争议。

一、行政机关已就检察建议书提出的建议履行职责并回复，但检察机关认为履行职责不全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是否全面的标准如何认定？是否容易出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

根据《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

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从该规定来看，只有对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并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较为容易判断，而检察院要求行政机关纠正的违法行为的标准和范围则容易出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争议。我们也注意到在现有的判例中，各试点地区的法院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标准确实存在不同的尺度，类型相同的要求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类的案件，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定为已形式上履行恢复环境职责，不支持公益诉讼人要求履行职责的请求。有的案件中法院却以履行恢复职责后，尚未使环境恢复到原来功能为由要求继续履行监督职责。由此也引起我们的思考，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使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履责行为，应该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对于诸如前述的十堰市的案例，行政机关已依法履行职责，使被毁林地已按规范标准种植林木，只是林木的生长还需要一定的自然周期，是否还有必要以林地尚未恢复原来的功能提起公益诉讼？这样的公益诉讼是否存在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检察机关是否有权直接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在我们办理的一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收到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后，对毁林行为的当事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并作出了回复，但检察院认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处罚过轻，应当适用另一法条做出更重的处罚，并以未依法履行职责为由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在这个案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检察机关是否有权直接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首先，根据《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足以说明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检察院已通过诉讼前程序要求其纠正，行政机关拒不纠正的情况下，检察院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即经过诉前程序，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已转化为了不作为行为，而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应该是针对行政机关拒不纠正的行为，而不是针对行政机关原来的行政行为。因

此，我们认为根据《实施办法》，检察院不能直接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行为的合法性提起公益诉讼。

其次，在行政机关已根据检察建议书的要求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检察院不应以行政机关做出的履行职责行为的法律适用、裁量标准等具体问题错误或不当为由提起公益诉讼。依据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是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对于行政机关已履行职责，既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合法性问题，应该也不属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我们认为《实施办法》的这一规定在避免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权方面非常重要。

对律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诉前程序的处理，帮助行政机关及时纠错，消化案件。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律师只能代理被告一方，而且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面建立以后，被告的代理律师往往是被告的常年法律顾问。由于诉前程序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这个制度的设置本身也是为了实现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和主动履职，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律顾问，应该尽可能帮助行政机关妥善处理检察

建议书，这个处理一方面是对检察建议书中提到的问题的实质整改或实质履行，对纠正或履行行为都应从法律上把关；另一方面是按要求及时回复检察机关。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告的败诉率来看，将案件消化在这个阶段对行政机关来说较为主动。

二、关注公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以便确定准确的答辩方向和提交证据，也有利于帮助行政机关主动履行职责。

三、关注公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是否有经过诉前程序。

四、在案件的答辩要点方面，紧扣《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结合案情分析是否存在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是否因此造成国家和社会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两大行政公益诉讼的要件。

五、根据《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行政公益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回起诉”。对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符合该条规定情形的，尽可能协助行政机关协调检察院撤回起诉。

六、担任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法律顾问的律师，应特别注意该机关行政处罚案件申请执行情况。很多行政机关都存在处罚案件未执行到位，但未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因执行不到位而被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占有很大比重，如果在收到检察建议书时已过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可能面临无法在诉前程序中纠正，从而被提起公益诉讼的风险。



精细化、高标准， 诉讼服务未来之路

文 / 邵贝湫律师 广东深宝（前海）律师事务所

传统的律师事务所办案，办案过程几乎完全脱离当事人，当事人无法清晰地获知律师在诉讼各阶段所做的工作。更有甚者，当事人在收到法院判决书时才知道诉讼流程已经走完，无从得知律师具体提供了哪些专业化服务。这种诉讼代理服务的旧模式，割裂了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当事人了解律师办案过程，必然会导致律所客户流失，业务萎缩。

笔者认为，诉讼代理服务的未来，必须是专注、专业。专注，才能专业；透明，才能可信。以“诉讼精细化”来统领和引导律师的诉讼业务，可以把律师服务“可视化”，规范诉讼业务办理的全过程，无论是对于律师业务水平的提升，还是巩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大有裨益！律师诉讼业务精细化可以是细化到每一个细节，以书面形式记录办案全过程和律师的办案思路变化路径，通过团队协作，高效处理好案件中的难点重点，确保诉讼利益最大化。



沟通磋商阶段

此阶段是确立当事人对律师团队的信心，争取当事人将诉讼业务委托给律师所的重要环节。

首先，律师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要做好《案件沟通记录》，对案件进行初步了解，详细记录案情，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判断，明确当事人的诉求和诉讼目的。

其次，接待律师要向律师所申请预立案，初审当事人的案件是否符合立案要求，填写《立案审批表》，确定诉讼双方身份信息，对案情进行简述和分析，经律师所业务负责人审批后，确定预立案。

再次，律师要做好利益冲突检索，防止总所和分所产生利益冲突，避免出现两所律师分别担任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如果发现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不一定要立即终止委托关系，而是可以向当事人披露实情，经友好协商，找到化解冲突的方式，有效规避律师执业风险。

最后，律师必须认真制作《法律服务方案》。《法律服务方案》是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是对案件焦点有针对性地剖析。《法律服务方案》主要包括承办团队的介绍、诉讼策略的选择、补充证据的搜集方

法，以及律师代理费报价、诉讼费用的预估等等。

签署委托代理合同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们要求全所律师使用统一的《委托代理合同》版本，但《委托代理合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格式文本，可以根据个案的诉讼风险、当事人要求而对《委托代理合同》部分条款做必要修改。修改后的代理合同要经过团队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才定稿，最后与当事人签署。

案件前期工作阶段

此阶段是诉讼前的准备阶段，律师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真填写《案件工作记录表》。详细记录案件办理工作过程中的工作内容、工作进度、遇到的问题以及每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时详细记录包括与案件承办法官的良性沟通，与对方当事人的良性沟通等事项。

二、制作《法律关系分析图》。每一个案件都可能会包含着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承办律师必须要把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以图表形式清晰直观

地表现出来，让自己以及团队其他律师更快地知悉案件情况，确立诉讼思路。

三、检索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通过各种途径检索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做到详细、明确，紧扣案件所涉法律关系，覆盖全部可能在争议中使用的法律规定。

四、案例检索。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一些类似案件的判例仍能成为法官判决的指导依据，因此，相关案例检索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要求承办律师必须要检索收集不少于五宗案例。

五、制作《风险评估报告》。每一个诉讼案件都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如何预防或者化解风险是律师办案考虑的重点。《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分析案件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对案件走向进行初判，得出风险评估结果。

诉讼代理阶段

此阶段正式进入诉讼流程，是体现律师价值的重要阶段。律师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撰写起诉状或答辩状。起诉状和答辩状是律师办案思路的体现，要求做到陈述完整、表达准确、逻辑清晰。

二、整理证据清单。不要以为证据清单只是简单地罗列证据，其实，证据的排列有着严格的顺序要求。不同的案件有着不同的排列要求，一般可以按照证据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或者按照证据主次顺序排列。证据清单要求重点描述每个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来源。

三、内部讨论记录。团队协作承办案件，必须有小组讨论记录，集思广益，在讨论过程中须发现突破点，真实记录小组讨论或者集体讨论的事项和过程。

四、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是我们律师团队办案的亮点，对于重点疑难的案件，本所组织团队律师分工准备，通过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预演、全真模拟开庭等环节，模拟诉讼审判或者商事仲裁的全过程，在庭前“实战”中发现问题，寻找诉讼突破点。“模拟法庭”也是律师积

累诉讼经验，掌握庭审节奏，提高应对庭审突发情况能力的重要环节。

五、准备代理提纲。开庭前必须准备代理提纲，预测对方可能抗辩的观点，寻找突破方向，层层设置攻防堡垒。

六、撰写《代理词》。《代理词》是律师代理诉讼案件智力劳动的主要体现。要求论证详细、说理清晰，紧密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必须体现出代理律师的鲜明立场。

结案工作

庭审结束并不意味着诉讼工作的完结，律师后期对案件的整理归档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完善的结案工作能够为往后的案件查询提供方便，节省搜索时间。结案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作《结案报告》。结案报告贯穿整个诉讼流程，是律师办案的心得体会，也是律师总结经验教训、分享诉讼成果的载体。制作《办案报告》有利于律师回顾案件，梳理案情，给团队办案提供一些经验技巧，促进团队专业水平的整体提高。

二、保留重要的送达回证。

三、案卷归档。一本完整的案卷，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律师的代理工作情况，能清晰的反映律师对案件的判断和分析，能完整地再现案件的主要事实，是研究案件、评价案件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律师团队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

结语

在“诉讼可视化”席卷法律圈的同时，“诉讼精细化”更应出现在法律人的视野里，毕竟，“精细”才能“可视”，“精细”才能出精品。推动精细化诉讼代理，不仅保证诉讼代理服务过程的规范和服务质量的稳定，力求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工作失误，能够有效防范和降低律师执业风险。笔者希望，“精细化的诉讼代理模式”能得到更多律师的重视，也能得到更多律师的应用。

精细化、高标准，是诉讼服务的未来之路！

表见代理在房价飙升情形下的一个真实案例评析

文 / 刘泽华律师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A和B系同胞姐妹，A名下有套深圳的房屋，A为了出售该套房产将其身份证原件交给同胞姐妹B，但并没有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2015年4月19日B以A的名义将该套房屋出售给C。据B称，其将涉案房屋出售给C时，明确指出其并非A本人，为其交易办理业务的房产中介人员证实在交易的过程中，C查看过A的身份证原件，但对AB照片明显不一致没有提出异议。后由于房屋价格飞速上涨，A以出售该房屋不知情为由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C将A诉至法院，要求A继续履行该房屋买卖合同，同时承诺可向A一次性付款，承担交易中的所有税费。

后经区市两级法院审理，本案最终被明确构成表见代理。

不同观点及理由

本案中，有两种观点：一、B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A应该继续履行该房屋买卖合同；二、B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C应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表见代理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因具有足以使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正当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面特征，因而被代理人须承受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制度。

表见代理的性质

表见代理中，“表见”一词，即表面上所显示的意思。表见代理实质上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但由于有代理权表象的存在，引起了相对人的信赖，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特设立了表见代理制度，作为无权代理的一个特殊例外情况，以区别于狭义无权代理。在市场经济的交易中，行为人是否享有代理权，其代理权的范围如何，相对人往往只

能凭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或被代理人的某些行为来进行判断。在某些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客观上却有代理权存在的表面现象，并且引起了善意相对人的信赖以至与代理人发生了交易。如果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与代理人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对人就会失去安全感，从而影响代理制度的信用和效益，从而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

表见代理的类型

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

即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授予他人代理权，或者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而不作反对表示，从而须对之负授权人责任的表见代理。但是，相对人明知代理人无代理权，或者应该知道代理人无代理权的，不能作为表见代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对各种

具体情况作了详细的规定：（1）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代理权。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签订的合同，应当承担责任；（2）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介绍信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代理权。介绍信中对代理事项、授权范围表达不明的，委托单位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合同签订人应负连带责任；（3）合同签订人未持委托单位出具的任何授权委托书签订合同的，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合同不能成立，责任由签订人自负；如果合同已经开始履行，应视为对合同签订人的行为予以追认，因而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需要继续履行的应当补办盖章等手续；（4）对借用其他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经济合同，借用人与出借单位有隶属关系，且借用人签订经济合同是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出借单位与借用人对合同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负连带赔偿责任。

权限逾越型表见代理

指代理人的代理权实质上受某种限制，但却因某种原因造成足以令相对人相信代理人的代理权未受该限制的假象而发生的表见代理。这其中通常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本人在对代理人委托授权时，存在着授权不明的情况，即本人在代理授权时未指明代理权限，或其指明的代理权限未在代理证书中载明。二是本人在授权时，对代理人的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却并未在委托书中载明，或向相对人发出授权通知中未加以说明。由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属内部关系，相对人通常并不知情，所以对代理权的内部限制不具有对抗相对人的效力。

权限延续型的表见代理

指代理权因法定事由终止，如代理权被撤销，代理事项完成或代理期限届满，但却因本人的行为造成足以令人相信原代理人代理权续存的假象而发生的表见代理。此项表见代理的成立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本人撤销代理权时，本应采取适当的方式

告知相对人或收回授权委托证书，但其未能这样做或及时这样做。二是代理权定有期间或限于特定的委托事项，本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未予载明，期间届满或特定事项完成后，也未采取适当的方式告知相对人。

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

无客观证据可以证明是A本人和C签署了该房屋买卖合同，但A将其身份证原件交付给同胞姐妹B的事实，并口头委托B出售该房屋的事实，可以证明A委托B出售该房屋是属实的，基于AB之间的特殊关系，A对B的行为是知情并同意的，所以构成表见代理。

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

本案中，案外人B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

第一，综观整个案件，C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A曾有书面授权给案外人B，要求案外人代其出售房屋并签订相关的房屋买卖协议，应由C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又因房屋属于价值高的财产，有关产权过户需向相关部门申请，并审核，并非可以随意代为办理。根据我国二手房转让的相关政策，房屋转让的产权过户手续应当由房屋所有人亲自申请办理，如其需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需办理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本案且不谈公证的授权委托书，连普通的书面授权书都没有，案外人根本无权代A进行房屋转让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书，C在案外人无任何授权书的情况，与案外人B签订房屋买卖合同，C本身存在过错。

第二，本案C有聘请相关的房产中介介入房屋买卖，C理应知道房屋在转让过程中如委托第三人代为出售的，应当有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又在房屋交易过程中，案外人B明确告知C，其并非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仅是房屋产权人的姐妹，且没有任何的书面授权委托书，C在明知案外人B属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仍与案外人B签订相关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可见C并非善意的房屋购买人，其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即使案外人B存在未向C说明其并非房产产权人的情况，本案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首先，C在与案外人B进行交易时，其有义务核实房屋出售之人是否房屋产权人本人，其在未经认真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案外人为房屋产权人，认定案外人是实际的合同当事方，从而与之签订相关合同，C并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

其次，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因具有足以使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正当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面特征，因而被代理人须承受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制度。本案C直接认定案外人是直接的房屋出售人，而非认定案外人是代理人，C与案外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可能是其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从而可知案外人B与C签订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相关构成要件。

A口头让案外人代为卖房，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委托。众所周知，房屋授权出售必须有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才能最终代理过户，故口头的说法并不构成真正的授权。另外，A让案外人代为卖房，实际仅是让其代为找人介绍看房，并没有让其直接代为签署相关房屋买卖的文件，案外人B直接签署房屋买卖等的相关文件的行为明显属于无权代理，又该无权代理，自始至终均未得到A的追认，应属无效。

综上可知，本案案外人B的行为根本不属于表见代理。

律师评析

本案遗漏了重要的案件当事人

本案，从A与C的陈述，均可知，案外人B在本案争议发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及C未依法将案外人B追加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本案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由不当，应属于缔约过失纠纷

依上所述，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无论案外人B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无权代理，首先应该明确B与C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自始无效的，由合同签订当事人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故法院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该合同有效的问题。

本案中，C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没有对缔约主体的身份进行查明，属过失。

故本律师认为应按缔约过失纠纷进行审理，首先明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再进一步审理具体的房屋买卖纠纷。

合同当事人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

在涉及金额巨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房屋买卖合同中，交易双方有必要严肃认真核实相关主体信息，有必要引进专业人员审核合同，规避风险。



租赁合同纠纷中出租人自力救济权探讨

——从一起租赁合同纠纷谈起

文 / 王尚辉律师 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王某与刘某于2014年6月28日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将王某所有的一间商铺出租给刘某，租期五年，自2014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29日，租金每月5日前支付，合同还约定“乙方拖欠租金超过30天或拖欠管理费、水电费两个月，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乙方须无条件立即迁出该物业且承担违约所造成的全部责任，及负责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自2015年7月起，刘某开始拖欠租金，截至2015年9月已拖欠两个月租金，王某发函刘某，通知解除合同要求刘某搬离未果后，雇请搬家公司在物业公司人员见证下将刘某存放于商铺的物品搬离并存放于他处，随后诉至法院，请求刘某支付所欠房租并承担违约责任。刘某提出反诉，认为王某擅自处理被告留放于涉案房产内的物品致其受损，请求王某返还物品并赔偿其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拖欠租金逾期30日，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依约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原、被告未就合同终止后被告留存物品的清理作出明确约定，原告将被告留存在涉案房产的物品自行搬离并存放他处的行为属于自力救济，虽没有合同依据，但原告在搬离涉案物品前已提前通知被告，并在自行搬离后及时通知被告领取涉案物品，对于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依法生效。

律师评析

近年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逐年增多，承租方拖欠租金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商铺租赁合同，承租方因经营不善，缴不起租金，久拖不付，给出租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困扰。走司法途径，旷日持久，最后可能赢了官司输了钱，结果不尽人意，自行清场又担心于法无据，反遭索赔。那么，当承租人拖欠租金时，出租人该如何处理，能否单方面清场，清场时注意哪些问题，笔者结合本案试对出租人的自力救济权作一探讨。

自力救济权简要分析

自力救济又称私力救济，是区别于司法救济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指当事人不借助第三方机构，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制止侵权行为捍卫自己权利而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并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

自力救济分为自卫行为和自助行为，前者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后者并无明确法律规定。由于自力救济易演变为侵权行为，其救济行为和方式受

到严格限制，只能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出租人自力救济通常表现为单方解除合同和自行清场腾房。单方解除合同是法律赋予守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只要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守约方便可单方解除合同。但是单方解除合同并不能完全解决出租人违约责任问题，若承租人拒不腾空并返还房屋，出租人的权利仍得不到保护，因此，出租人只有自行清场才能有效地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维护自

己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告自行清场的行为亦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

出租人自力救济的法理基础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能否采取单方清场等自力救济行为，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出租人可以采取单方清场等自力救济行为，其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于物权理论，租赁合同因承租人违约而解除后，承租人继续占用出租房屋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其滞留行为侵犯了出租人的物权，作为出租房屋的所有人，出租人有权采取措施排除妨碍，收回出租房屋。

二是基于担保物权理论，出租人可对承租人滞留于出租房屋的物品行使留置权。留置权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承租人取走留置物的异议和阻止；二是出租人可对留置物进行拍卖、作价等，以受偿其债权。对于房屋出租人的留置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以及瑞士、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均有相应的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45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的出租人，就租赁契约所生的债权，对于承租人之物置于该不动产者，有留置权；但禁止扣押之物不在此限”，日本民法第312-314条称之为“不动产出租的先取特权”，德国民法典第562条称之为“出租人的质权”。我国法律未有相关规定，但此项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三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考量，公力救济耗时费力，导致出租房屋长期被占用而不能转租，自力救济则可以立即排除承租人的非法占用并将房屋转租，有利于商业流转，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节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法律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应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没有理由对自力救济给予否定的评价。且现行法律虽未对自力救济加以明确规定，但也没有对其予以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在承租人根本违约符合合同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出租人有权采取单方清场等自力救济行为。

出租人自力救济应注意的问题

出租人自力救济权虽不为法律所禁止，但由于

缺乏法律明确规定，出租人在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稍有不慎，清场行为便易演变为侵权行为，反遭索赔，本案被告反诉原告侵权提出巨额索赔，因原告救济措施得当而未得逞。那么，出租人在单方清场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笔者结合本案的办理，总结如下：

单方清场前应先解除租赁合同

解除租赁合同是单方清场的前提。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承租人拖欠租金超过合同约定的时间，构成根本违约，且由于其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

单方解除合同除需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外，还需履行法定的程序，才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单方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即一方当事人通过其单方的行为就可以使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就租赁合同而言，出租人只需向承租人送达解除通知，即可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送达的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快递送达，也可以微信、短信、电子邮件或将通知张贴于出租房屋等方式。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应注意保留送达的相关证据。

单方清场应履行一定的程序

由于单方清场易演变为侵权行为遭致对方索赔，出租人在单方清场时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确保清场过程公开透明，做好证据的保全，避免争议。首先应提前通知承租人，告知其清场的时间；其次，可邀请居委会或物业管理处派人现场见证清场过程；第三，做好清场过程的全程录像，物品一一清点，记录在册。第四，要妥善保管滞留物品。

播种公平正义，一直在路上

文 / 周海涛 记者 中国改革报
——记深圳“1+1”法律援助律师贵铸



从深圳到云南墨江，距离约1270公里；从深圳到西藏山南，距离约2345公里；从深圳到内蒙古包头，距离约2050公里……这是深圳“1+1”法律援助律师贵铸5年多来的法律援助足迹。

经过一晚上考虑，他决定到西部去——

“一辈子不能只是为自己考虑”

今年53岁的贵铸律师是辽宁大连人，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沪西学院机械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旁听了一次法庭庭审，从此对法律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7年考取律师资格后，他正式进入法律界工作，在家乡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年。2001年，他决定到深圳以谋求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先后担任深圳岭南集团等多家公司法律顾问，并逐渐成长为一名擅长房产纠纷、合同纠纷、工程建设等领域案件的资深律师，现供职于广东德城律师事务所。

2012年的一天，贵铸在深圳市律协网站上看到一则招募“1+1”行动志愿律师的通知。所谓“1+1”行动，是指由司法部、团中央发起，每年向全国无律师县及中西部律师人才短缺的地、市、县派遣一名律师和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的志愿行动。

当时，贵铸已经是一名有着十四五年经验的专职律师，子女正在读大学，家庭负担较小。“经过一晚上的慎重考虑，第二天我就去报了名，而且一填就是3年的志愿服务期。”这并非人到中年的贵铸律师一时冲动，而是觉得到子女长大后有了自己的世界，也是时候实现他自己的梦想了。

“年轻时，我就有为社会做点什么的想法。”他说，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总是为自己考虑，这个社会给予了我们很多，我们也该为社会、为他人做点事情。

据深圳市律协工作人员介绍，自2012年以来，贵铸是我市唯一一位连续五年参加“1+1”法律援助的律师。5年间，他走遍了云南墨江、宁洱两县全部24个乡镇，在西藏山南承办各类诉讼案件168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00多万元。

“我没有觉得出来做志愿律师有多苦，也许生活上会比深圳差太



贵铸律师（中）向服务地市民宣传法律知识

多，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所带来的快乐和慰藉，有着另外一种满足感，这是相对于金钱以外的另一种富有。”他说。

在边远山区，人民群众更需要懂得法律——

“我愿意留在这里为他们服务”

墨江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是一个以哈尼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县，县内共居住着哈尼、汉、彝、傣等25个民族。由于经济相对落后，面对多发的矛盾纠纷，当地群众往往因为文化程度低，不懂得如何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原来，在法律资源匮乏的地区，人民群众确实需要我们的志愿服务。”这是贵铸律师到达服务地的最初体验。

刚开始志愿服务没多久，贵铸被指定为一名运输毒品罪被告人作辩护。庭审结束，被告人走到辩护席边上，向他深深鞠了一躬，眼含着泪水，连声说谢谢！

其实，该案被告人只是四川大凉山区深处一名贫穷的农民，被别人利用稀里糊涂地运输了将近8千克的毒品，没想到最后被判了死缓。与家属会见时，看到年迈的奶奶和不到两岁的孩子，被告人哭着说：“自己是想让奶奶和孩子生活好一点，才做了这个事情，根本没想到会犯这么重的罪……”

那时，作为一名律师，贵铸才深刻地认识到：在中西部边远贫困山区，人们是多么需要懂得法

律，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为了让大家获得更多法律知识的机会，我愿意留在这里为他们服务”，他暗下决心。

不同于在深圳执业，贵铸律师在服务地接触的案件，除了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外，大多是民事纠纷以及工伤等琐碎案件，除了专业的法律知识，更多需要的是律师本人耐心地讲解……

少数民族群众大多善良、纯朴、诚实，虽然文化教育程度低，对法律的认知度也欠缺，但贵铸律师发现，只要在纠纷调解过程中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事实和法律讲透彻，他们大都能接受调解意见。“遇到诉讼案件，少数民族群众明明知道对方没有证据，但只要是他们做过的、承诺过的，他们都会认可。”这种诚信精神让贵铸律师很惊讶，并感动于他们身上善良诚实的良好品格。

不少当地人也会提出疑问：好好的城市不待着，来我们这儿有什么前途？贵铸律师说，他相信每一名志愿律师是抱着为社会服务的心态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想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不一样的经历。

“每完成一项法律援助案件，为当事人争取了最大的利益和权益时，当事人的感谢，服务地的满意，就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份工作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他说。

服务地业务单一，认知与习俗不尽相同——

“从事法律援助需要一点点摸索学习”

由于服务地业务相对单一，缺少在深圳等大城市里所遇到的复杂、高端以及多样化的法律问题，所以法律援助律师容易与派出地的现实脱节。一些志愿律师反映，刚到服务地，初期开展工作时并没有太多头绪，毕竟社会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有很多要求此前没有接触过，只能通过一点点摸索学习。在一个新的工作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层面从陌生、熟悉，再到融入，一年的服务期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很难做多少实际的事情。

2012年7月，贵铸律师刚到云南墨江时，同样没有法援工作经验，经常是别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逐渐地，贵铸律师发现当地程序以及工作方法很多与以往接触到的不尽一致，他通过自己上网查找，向服务地省司法厅查询相关文件与资料，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程序，并专门制作了常用文件的电子文档，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于工作中需要接触的公检法等部门，贵铸律师经常请他们将自己介绍给政府各部门，让更多人知道有法律援助律师在服务地，这样便于他开展工作。除了法律援助工作，贵铸律师还参加法律宣传、社区矫正、人民调解等工作。

依托“1+1”法律援助平台，众多律师有了发挥才干、奉献社会的舞台。然而，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困惑，别人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不理解，社会律师由于缺少机关单位工作经历，在实际工作理念和方法上与服务地不尽相同，这些现实困难极大考验着志愿律师的能力和耐心。

“各个地方的社会认知与风俗习惯不尽相同，我们不能对服务地的事情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只有认真工作，踏实做事，才能用过硬的业务能力赢得认可。”为此，贵铸律师总结了几点工作经验和方法：

1. 多与服务地政府机关、公检法等部门交流沟通，从他们那里得到做事方法，或者工作上互相协助。
2. 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要服从服务地的领导和指挥，同时提高积极性与主动性，扎根基层地方，全面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3. 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为服务地留下自己的经验和做法。
4. 在工作过程中，逐步规范和完善法律援助文件，以及法律援助工作程序。

“短暂的法律援助期间，志愿律师为服务地的法治环境改善，只能起到初步且细微的积极影响。因为时间短暂，一些优秀的工作方法和建议还没有完全开展，志愿律师就离开了。所以，把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转化为规范化的文件和工作程序，就显得特别重要。”贵铸律师说，目前，他经历过的地方都有法律援助中心，并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工作模式。

参加志愿活动，他不图名更不图钱——

“只是为了自己的信念、理想和社会责任”

今年7月中旬，新一年的“1+1”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正式启动，贵铸开始了第6年的征程，远赴内蒙古包头石拐区开展志愿服务。

对于很多人来说，到边远地区志愿服务一年，已经是很大的奉献和牺牲，而他一干就是5年，至今仍乐此不疲。在云南服务的3年间，他走遍了服务地全部乡镇，与哈尼族、黎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办理各类案件190宗，调解220宗，进学校、乡镇、街道、党校等单位做法制讲座18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550万元。2014年，广东省司法厅发文对表现突出的志愿律师予以记功，贵铸律师荣立个人二等功。在西藏山南服务的两年期间，他承办各类诉讼案件168件，接待群众来访来电1080人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00多万元，获得西藏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2016年度优秀志愿律师”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专职的执业律师，我参加志愿活动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不图名更不图钱，只是为了自己的信念、理想和社会责任。”贵铸说，他愿意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即使这力量是弱小的，尽可能地改善中西部边远地区的法制环境，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

“每每看到群众渴望与期望的眼神，看到他们对律师的期待与希望，我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他说，虽然参加志愿律师活动已满五年了，但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下一个五年的征程。

今年7月中旬，“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2016年度总结暨2017年度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贵铸律师获评2016年度“优秀法律援助律师”荣誉称号。当晚，他引用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在朋友圈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假如我能阻止一颗心破碎，我的生活就不再徒劳无功。假如我能为一个生命减轻痛楚，或者抚慰一处伤痛，或者帮助一只昏晕的知更鸟，回到它的巢中，我的生活就不再徒劳无功……

如果，有人犹豫是否报名参加2018年度的



今年7月，全国优秀志愿律师受到表彰

“1+1”法律援助行动，贵铸律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辛苦，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做好吃苦的准备。到达服务地以后，或许与想象和预知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我们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我们代表的是深圳和广东，一定要为派出地争光，为服务地留下好印象。我们志愿律师的身后，是深圳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是广东司法厅和省律协，他们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们踏实而坚定！

深圳律师热心公益，善举回馈社会——

13位律师先后参与“1+1”法律援助行动

2009年以来，“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已连续八年向中西部地区的392个县（区）派出了1300多人次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4万余件，开展普法宣传和法治讲座超过1.8万场，为上百万困难群众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化解了上万起群体性矛盾纠纷，直接受益群众达1570万余人，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30亿元。“1+1”法律援助行动的实施，提高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能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为“一带一路”、扶贫攻坚等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贡献了力量。

2012年至今，深圳共有13位律师、28人次参加

“1+1”法律志愿者行动，他们分别是金峰、贵铸、高立明、黄庆春、严世勇、刘运坤、刘雪坛、范国伟、张平、陈健、程珊珊、魏耀红、易湘洋。我市“1+1”志愿律师放弃都市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分赴山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新疆、青海、陕西、西藏等中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了当地群众和司法机关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陈健律师作为深圳第一位参加“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女律师，2014年被派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健律师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9宗、举办法制宣传讲座15场、接待法律咨询662人次。

2014年，广东省司法厅发文对2013年度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表现突出志愿律师予以记功。我市贵铸、严世勇、黄庆春律师荣立个人二等功，刘雪坛、刘运坤律师荣立个人三等功，占此次获表彰律师的比例超过1/3。我市严世勇、黄庆春、高立明、贵铸四位“1+1”法律援助志愿律师被评为2013年度专项工作先进个人，荣获深圳市司法局“个人三等功”。经广东省律协十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广东省律师协会授予我市金峰、严世勇、黄庆春、贵铸、高立明、刘雪坛、范国伟、张平、刘运坤等九位律师“法律援助贡献奖”。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深圳律师业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市司法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律协和全体律师的共同努力下，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蓬勃发展，走过一路辉煌，在深圳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深圳律师热心公益，善举回馈社会，“1+1”法律援助行动是重要例证之一。

NO.1 徐文海副市长专题听取律师工作汇报

2017年8月8日，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市律协会会长林昌炽赴市公安局，向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徐文海汇报律师工作。蒋溪林局长汇报了司法局参与深圳作为首批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工作的构想以及近期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监狱管理、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工作情况；林昌炽会长汇报了市律协换届工作情况及目前深圳律师业发展整体概况、十届律协工作思路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徐文海副市长高度肯定司法行政部门有活力、敢想敢干及十届律协工作思路和新气象。



NO.2 市中院、市司法局、市律协展开三方座谈

2017年8月1日，市律协会会长林昌炽、市司法局律公处处长熊松青、市律协副会长蔡华、杨道、尹成刚、曾迈，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郑剑民，市律协理事刘庆江、李军强、罗振辉、胡宁可、潘翔，市律协权益保障委主任方壮毅、法律职业共同体副主任廖炜冕一行赴市中院进行交流座谈。

市律协与会人员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智慧法院提出建议意见，如：律师参与调解应明确工作方式、引入实习人员需考虑工作模式、建立律师与法官联系机制纳入等。



NO.3 首轮法律技能刑事法律专题巡回讲座圆满结束

2017年8月23日，“刑事法律服务技能”专题巡回讲座的启动仪式在市律协多功能厅正式举行，随后，培训委陆续在深圳各区进行“刑事法律服务技能”巡回专题讲座；至9月25日，随着本次法律技能巡回讲座之“刑事法律服务技能”罗湖站的圆满结束，首轮法律技能刑事法律专题巡回讲座圆满收官。

本阶段法律技能巡回讲座先后在福田、龙岗、宝安、龙华、南山、罗湖六区顺利开展，惠及深圳各区，涉及主讲嘉宾15人次，近千名律师参与巡回讲座。



NO.4 刑辩无止境 研修普青春——第八期深圳青年律师研修班扬帆起航

2017年8月11日，第八期深圳青年律师研修班开班仪式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会议厅举行。市律协会长林昌炽、副会长杨道、副监事长肖迎红、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顾问吴波、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剑民、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平凡、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云、往届深圳青年律师研修班学员代表杨林应邀出席，第八期“深圳青年律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参加仪式。开班仪式由市律协理事、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伟主持。



NO.5 市律协召开新闻媒体见面会

2017年8月4日下午，市律协召开新闻媒体见面会，十届律协工作团队首次向媒体亮相。来自法制日报、中央电台华夏之声、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深圳晚报、深圳商报、晶报、深圳电视台、深圳电台等17家媒体19位记者参加了媒体见面会。

媒体表达了对深圳律协感谢和对十届律协换届的关注，并就关心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建设、律师学院建设、大湾区法律问题研讨以及未来可以创新提供的法律产品和服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NO.6 市律协举办《民法总则》的理解与适用专题讲座

2017年9月17日，市律协联合深圳国际仲裁院在深圳特区报社举办《民法总则》专题讲座，本次讲座邀请中国人民法学会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辉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全市近千余名律师参加本次讲座，市律协副会长汪腾锋、深圳国际仲裁院副院长王素丽分别致辞。

姚辉教授结合参与编撰民法典的经历和曾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审判经历，介绍了《民法总则》的立法背景和结构体系，并结合87年《民法通则》和当下司法实践热点，对《民法总则》的重要内容进行深入阐释。



NO.7 严把行业入口关 确保合格人员进入律师队伍

8月13—8月14日，市律协举办了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培训，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应邀参加，市律协会长林昌炽，省律协副会长黄思周、陈方，市律协副会长章成、江定航，实习委主任胡宁可，监事刘鸿，实习委副主任周俊波、任松龄、张健以及130余名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参加了培训。经市司法局审核，本届市律协共聘请了188名考官。

通过此次培训，考官们对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新实习人员考核模式和标准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NO.8 市律协多方位开展9.25宣传日活动

2017年9月25日是第十四个全国律师宣传日，为进一步宣传律师制度及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委运用多种宣传手段，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进行资源整合创新，形成多角度立体化宣传模式，争取引起社会对律师的广泛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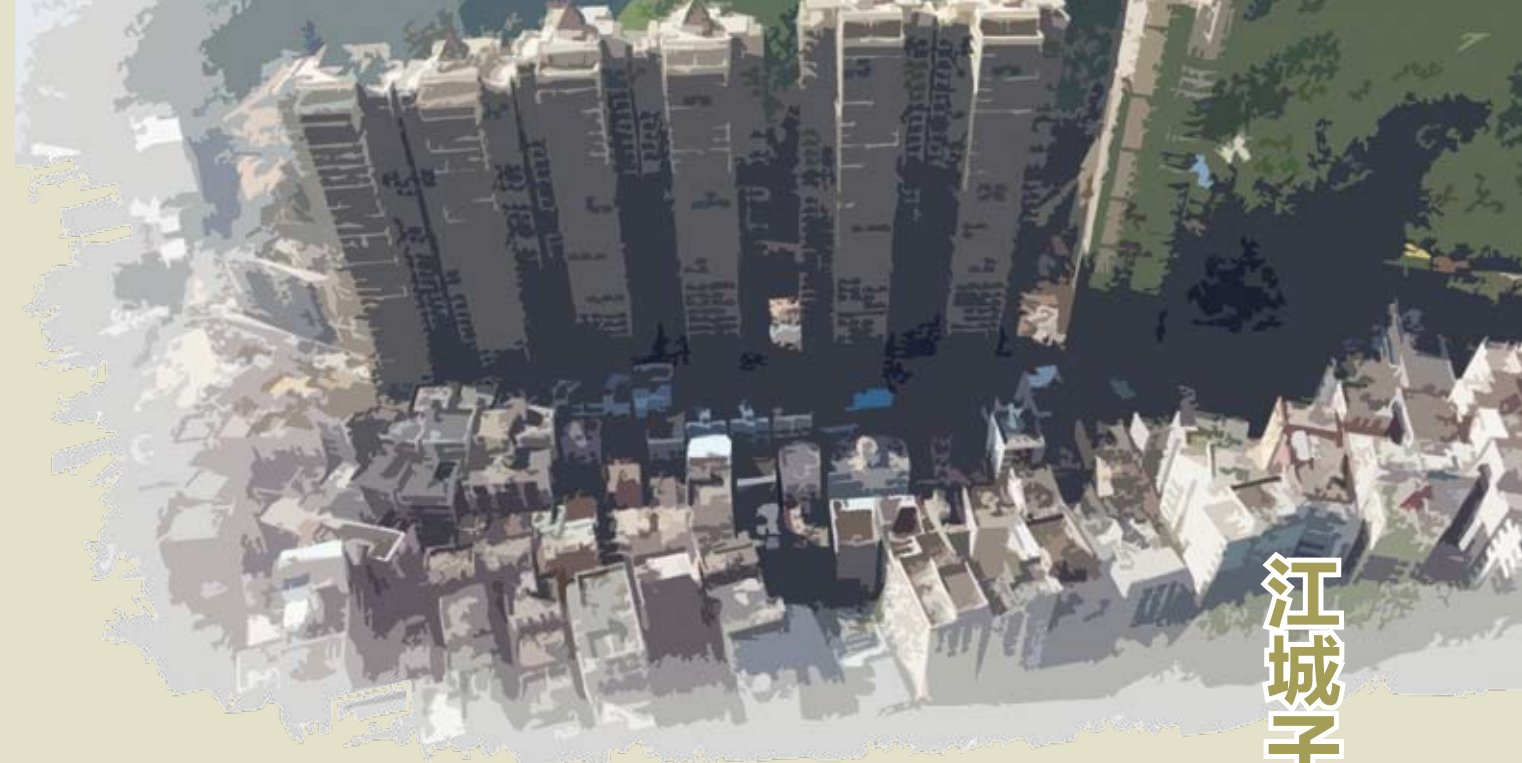
一是与深圳市宝安区滨海小学联合组织小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二是组织律师在898电台《明白说法》栏目进行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律师在图书馆进行为群众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四是拍摄《你所不知道的律师》微视频微信宣传深圳律师正面形象。



NO.9 市律师协会与波兰格但斯克律师公会签署友好合作协议

2017年6月29日，波兰格但斯克律师公会在格但斯克奥利维亚商务中心召开“中国-波兰‘一带一路倡议下商机’研讨会”。深圳市律协副会长韩俊及二百余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专家、企业家等人出席研讨会。

韩俊副会长介绍了深圳律师国际化的主要实践工作并发表演讲；以及代表深圳律协与格但斯克律师公会签署合作协议，协议就深化双方法律合作，各自法律制度系统的信息交流、学习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旨在推动双方法律业务的交流和合作，拓展法律业务合作的范围。



江城子·棚改汇编

文/王劲松律师 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

寒灯伏案夜犹长，字成行，句成章。
莫笑执着，再作少年狂。
欲得梅花香彻骨，经雨雪，历冰霜。
卷中共度好韶光，纵辛劳，又何妨？
无暇偷闲，收拾旧屋房。
更有情怀同把酒，棚改业，更辉煌。

——为罗湖棚改编辑《棚改法律文件汇编》，有感而作。